周立，赵赟，潘家恩，等．“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2）［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4）：1-36.
ZHOU Li，ZHAO Yun，PAN Jiaen，et al. Discovering rural China in the interelinary fieldwork（2022）［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4）：1-36.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3.04.001

题记：大疫袭来，封村断路。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三年来几次组织在城乡中国之间再次游走，皆难成行。借福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的机会，各路学子再聚乡村，驻地研修。疫情封控加快了全球本土化步伐，也使得研修走向在地化。于是，《“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和2019之后，又有新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同样求诸于野。在这个基本常识缺乏的时代，再次由草尖溯回到草根，发现中国道路，发现乡村力量，发现未来希望。

“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2）

周立[1]，赵赟[2]，潘家恩[3]，王松良[4]，韩君倩[5]，王玉[6]，张赛[7]，李苗苗[8]，王金妹[9]，樊子塽[10]，罗建章[1]

（1.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2.山西农业大学 期刊中心，山西 太谷 030801；3.西南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4.福建农林大学 农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5.中央新影集团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88；6.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7.西南大学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6；8.江西科技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9.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福建 宁德 352300；10.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4-0001-36

一、周立：由神农论坛到粮食安全屏南行动

2018和2019年，我们已经组织过两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乡村游学。2020－2022年期间，新冠疫情肆虐，各地多轮封控，我们大规模的乡村游学，几次策划，都难成行。但小范围的乡村调研，每年都有十多次。2022年8月，借着福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的机会，不同学科的学者朋友再次聚集乡村，开始了驻地巡游和行动。在让许多人不断“翻山越岭到四坪”的屏南古村，笔者领了一张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专家的聘书，还和《开放时代》的吴重庆教授，各领了一个“乡村访问学者”的牌匾。在接受首位乡村访问学者的牌匾时，笔者发言：“礼失，求诸于野；学失，同样求诸于野。”如今是一个基本常识缺乏的时代，需要回到乡野，才能找回基本常识。比如在硕博研习营“城乡中国与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可能”开场讲座中，我多次提问一些基本常识问题，发现我们这些十分关心乡村，已经在乡村做事的人，依然缺乏关于乡村的基本常识：大家对中国城市面积占比的回答，多数在20%～60%之间；对乡村产值占比的回答，多数是在30%～70%之间；对一季庄稼到底需要农民投工投劳多少天，也更与实际大相径庭；对目前乡村还有多少人口，主要是哪些人留守，也没有明确的认知……

研习交流中，真的体会到了：礼失，求诸于野；学失，也要求诸于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乡村发现中国”同仁的福建屏南行，汇集了赵赟、潘家恩、王松良、韩君倩、王玉、张赛、李苗苗、王金妹、樊子塽、罗建章共11位同仁的不同角度发现，其中有3位80后，4位90后，年轻同仁的力量，超过了一半。让我们对乡村的希望和未来，又多了几分信心与盼望。

回想乡村研学，我们还应追溯到2017年开始的四次“神农韩国行”，那是“在世界发现乡

村”。自2017年9月以来，我们做生态农业研究与实践的同仁，每年组织一次韩国乡村参访，访问中受日本爱农会、韩国正农会的启发，我们组织了神农论坛。并在2018－2020年连续在不同地区的乡村，组织了“神农故事会”、“神农尝百草”、“神农中国梦”三届神农论坛。2018年春首届神农论坛在河南绿色方舟农场召开时，笔者也通过《神农论坛宣告》，介绍了神农论坛的源起与宗旨：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然时不我待，人不再畏神。以各类农药、化肥、激素、基因改造等，注入土地，注入植物，注入动物。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不尊神造，不按其时，怎有美好？

农道之不存，久矣。欲人食天物，难矣。

今有神农一应会众，感知农业逻辑倒置。市场规律，俨然凌驾于社会规律及自然规律之上。脱嵌之恶果，不仅是食不能安，更有山不再青，水不复绿，人亦不愿以爱，彼此相待。神州各地，有新神农氏，与众民同此凉热，同感蛊毒。遂大发热心，奋兴立志，戮力同心，或作共生社区，或作传道农夫，或作生态农业，或作环保农村……恢复生命农业，还我和美乡村，立志荣益农民。

神农一会，圣洁农地。发端于兹。有真光，耀耀其上；有行者，躬耕其中；有隐者，默祷其下。同力同工，同善同行。

今立约一年一会，以身，以心，以灵，彼此建造。神之帐幕，农之民间。复按其时，复有美好！

当2020年年初疫情袭来，神农论坛也组织了对日本、韩国、印度、柬埔寨、肯尼亚、土耳其乡村的疫情慰问与捐助，组织了神农论坛情商工作坊、领导力工作坊、生态农业工作坊，使得乡村的多种功能、多元价值，能通过一些躬耕乡野的人士，发挥出来。

通过近些年对日韩台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农村的参访，我们产生了对中国乡村未来二十年的愿想。就将神农论坛的宣告，进一步凝练为三大信条：生命农业，和美乡村，荣益农民。这表达了我们新神农氏对“新三农”的图景期许：做以生命滋养生命的农业，建和谐美好宜居宜业的乡村，成荣耀上帝有益他人的农民。三大信条在中国不同地区实践中，虽然颇有挑战，但也发挥了很有价值的指引作用，使得我们感受到这种走出国门，在世界发现乡村，在乡村发现中国的魅力。2023年疫情防控降级，国内外互动畅顺后，我们还将有不少国内外乡村访问游学的安排。

就2022年而言，我两到福建，在德化、永春、屏南等地，与乡村研学同仁驻地研习，意图



图1 在绿色方舟农场召开的首届神农论坛（2018）

从乡野中再次找到学问的起点。在给当地县委中心组做“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讲座中，在“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的调研交流中，我体会到研习营年轻学子的渴求，感动于当地干部的务实，也感念屏南新农人躬耕乡野的努力。由此激励同仁们立志：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也活到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态，永远保持谦卑受教的心，就能如我们随处可见的树木花草一般，每天进行身心灵魂的“光合作用”，在智慧能力上不断成长。

在四坪村、龙潭村、前汾溪村、厦地村等屏南古村调研中，看到山乡巨变，人去屋空，却有人做了最美逆行者，驻地扎根，让乡村重新焕发活力。更加认识到，不仅要认识乡村，还要在乡村做事，让乡村的绿水青山，真正能变成金山银山。我结合在山西大宁等地的探索，给屏南提供的制度设计，是租利两得，通过三级市场，落实三变改革的成果（“官三变”），实现真正的乡村三变（“乡三变”“真三变”）。当地干部还从熙岭乡四坪村这个小切口，开始了操作化方案的讨论，并着手落实。

但这几年屏南乡村最具全国影响力的，是“粮食安全屏南行动”。

在“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研讨会上，笔者回顾了近些年参与粮食安全讨论的过程，并提出了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的3.0和4.0方案。



图2　在屏南召开的“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研讨会（2022）

理解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的基本背景，是在地化、城乡中国和市民教育。

第一个背景是在地化。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何一方水土，能养活一方人？原因就是在地化（Localization）的食物体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吃海。“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数千年来的食物体系，原本都是在地化的，现在食物体系全球化（Globalization）了，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了。为了应对近些年全球化脱钩甚至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带来的各种危机与挑战，我们还需要创造条件，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适度回归在地化。让在地化的消费体系与在地化生产体系对接起来，是理解和提升粮食安全屏南行动的关键。

第二个背景是城乡中国。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多论述，不再详述。总体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不再是费孝通所言的乡土中国了。城乡各半的人口结构，早已崛起的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西方称Middle Class，“中产阶级”），形成了农产品消费在城市、生产在乡村的格局，使我们必须打通城乡，才能为乡村找到市场之力，为城市找到幸福之根。

第三个背景是市民教育。当前，大城市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在20%上下，食物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已经达到富裕阶段，但思想观念却远远滞后于物质丰富程度，没能树立起绿色消费、生态价值支付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看来，农民没毛病，市民有毛病，消费者有毛病，而且病得不轻。消费者长期活在“质优价廉”的鱼和熊掌兼得幻想中，在与自己的生命健康最息息相关的食物上，斤斤计较，不舍得花费，宁可一直谷贱伤农，却不愿米贵伤民。实际上，生态大米每斤哪怕提价10元，一个消费者按每天4两米计算，每个月在大米上也至多多花120元。对于多数市民没有什么经济伤害，却换得满满的健康益处。对于农民的经济激励，却是数十倍的增加。对照一下日韩，就知道我们的消费价格体系，极不正常，极不合理，产生不了对生态农产品持续供给的激励。

1.0版本的屏南行动，应该说是自下而上、由外而内的，是市民农业。这主要由新村民在2015—2020年期间发动。驻村艺术家林正碌、程美信、张勇他们，有着艺术家的创意，要激活每

一寸土地。他们率先不用化肥农药，进行生态化生产，以配合他们的新生活运动。2020年温铁军、潘家恩等学者调研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时，通过孕育生态公共品牌“屏南800”，提出并深化了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就市民参与食物生产来说，屏南相对于全国较晚。河南兰考购米包地是2005－2006年，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是2008年就开始了。市民参与粮食生产，参与食物体系重构，是一场社会运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自我保护。自下而上、由外而内的创新行动，对于福建，对于南方丘陵地区，应该说是一个宝贵的尝试，尤其是由艺术家，由创客去做，这个行动就颇具福建特色、屏南特色了。

2.0版本的屏南行动，是自上而下的，是党政商参与的政治农业，体现了党政同责与使命共担。2021年，屏南县委县政府在与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总结“购米包地”探索的基础上，共同策划发起“粮食安全屏南行动”，温铁军教授带头认购“一亩田”，亲自下田插秧，倡导更多市民以实际行动支持粮食安全，吸引全国各地的市民、社会团体、企业、公益机构以及屏南县内党员干部认领良田500余亩。通过党政商这三股力量参与，推出了“我在屏南有亩田”这一响亮的口号，使得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开始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说实话，党政商的参与，只是承担了粮食安全的部分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并不具有市场体系的可持续性。比如说，定价机制不完善。如果借鉴2006年河南兰考购米包地的做法，至少应该召开价格听证会，要让生产者、消费者和业界专家，一同坐在一起。让懂农业的人当中介者，讲点公平话，算一算生产成本到底多少，应该还有多少价值未被计价。比如，屏南不是出了一个最高领导都批示了的工料法吗？那么粮食上能不能做个工料法？算清楚了，才能说服消费者为食物生产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买单。这还不说政治价值，政治价值应该是政府买单，比如发放食物券，定向补贴低收入者，补贴当地食物购买者，每斤补贴10块钱，就能真正为当地的粮食安全买单。“我在屏南有亩田”的购米包地，应该有个良心价，底线是成本价，再逐步说服市民和市场，接受生态、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多元价值，最终形成一个公平贸易体系。如果理顺价格关系，每亩地额外产生五千至一万的新增价值，恐怕就不需要再去政治动员、全民开荒，一定会有人主动开荒，包括在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家，都会考虑扛起锄头了。锄头里就真能刨出金娃娃了，刨出一个共同富裕了。

3.0版本的屏南行动，就要走出农业看农业，就不只是1.0版本的自下而上、由外而内，2.0版本的自上而下、政商参与，而是上下互动的在地化农业。新农人、新创客，将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穿越到未来，看一看欧洲、日本、韩国，和咱们的台湾地区，就知道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上退居到二线，更多是让市民来做。农民做农业，只能发挥农业的生产功能，顶多发挥一点生态功能。市民做农业，就会发挥生活功能和生命功能。看看咱们参与研讨会的好多新农人，要么返乡，要么入乡，要么回乡。在城乡中国背景下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会玩新花样，就不只是把农业当成生产性农业，不只是把农业当成种地打粮食的传统行业。在农业生产之外，还会考虑生活功能。让农业可以体验、可以教育、可以研学、可以康养。种稻子就不仅仅是种稻子了，可以种出稻花鱼、稻花虾、稻花鸡、稻花鸭，可以让市民参与插秧，市民参与收获，市民参与管理，市民云上观看……农业的生活价值、生态价值、生命价值，都会被挖掘出来。在地化农业，会形成在地化的生产与消费合一体，使得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四生农业”功能都能发挥出来。也使得农业真正实现并超越一二三产业融合，带来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值增值。

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可以展望一下4.0版本的屏南行动。我们常说农业4.0，只有新农人，才能把农业由1.0（以生产功能为主），一步步提升到农业4.0（一二三产业融合，互联网＋）。通过3.0版本的粮食安全屏南行动，4.0版本已经初现端倪了。有了新农人参与，虚拟现实的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农业，就会被创造出来。4.0版本的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在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的数字农业背景下，正一点一点呈现出来，这就是虚拟现实的互动，这就进入了数字孪生时代。在数字孪生时代，如果你不在云上先看到，现实生活中就不会去消费。云上先看见，现实去体验。如同“数字孪生”这个说法那样，可

以将虚拟和现实做成双胞胎，在云上做出虚拟的，能够被看到，在现实中体验实体的，流量变现。数字农业这个孪生兄弟，就真正能变成现实。使得我们不仅有阿凡提式的农业，更加有阿凡达式的农业。粮食安全屏南行动，虽然是后发的，但有后发优势，完全可以后发先至。

为了率先创新，我们的观念就要先改变。如同前汾溪村陈子劲老师提出的“丈量整理，想象建设”八个大字，大有深意。有了想象力，才有行动力，才知道怎样做建设。将来农业的很多新业态，不仅是数字农业那么简单。未来条件成熟，我会请来国内食学研究和治理的专家，设计屏南的整个食学和食政体系，促成整全治理。比如围绕药膳文化、养生养老，围绕药食同源、食皆求寿，形成食农体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自主创新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成立了食政问题研究中心，在推动全国的食物体系整全治理（整全食政）。屏南一小步，将来可能成为全国的一大步，甚至是世界的一大步。

愿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也在乡村建设中国，使中国的未来，越来越美好。

二、赵赞：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中国乡建的火种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

自8月12日从福建返回，过去半个多月了。半个月来，不时想起在四坪度过的短暂而又充实的一周。一直想动笔，却又近乡情怯，生怕一落笔便会合上日记，从此只剩下文字这点回忆。满胳膊蚊虫叮咬的包消了、皮也脱了，再不写点什么，这段经历也会淡化消失吧？乡村振兴每天都在发生着新鲜的故事，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结缘长治振兴村

2018年12月22日—23日，以“新回乡运动——乡村振兴的新希望、新路径”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在长治市上党区振兴村举行。此前几日，我们特意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胡跃高教授等一行专家在山西农业大学召开专题论证会，想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变更刊名为《乡村发展研究》。胡老师热情地邀请社科版主编、校党委书记廖允成教授参加振兴村的会议，于是我们一起放弃了双休赶往长治。在长治振兴村召开乡村振兴的会议，不仅名称契合，内容也贴切。400多名参会代表齐聚一个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这次会上，再次见到了中央党校张孝德老师，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温铁军老师，中央党校的徐祥临老师、刘忱老师，中国农大的朱启臻老师、何慧丽老师，中国人大的仝志辉老师、周立老师，中国社科院杨团老师，等等等等。总之，后来我才意识到，中国乡建领域最活跃的一群良心学者几乎被我“一网打尽”。

作为一名学报编辑，学者就是最宝贵的资源。长治振兴村一行，不虚此行！除结识一帮业界大咖，廖书记还承接了温铁军、张孝德老师的一个重要委托，那就是2019年筹备并召开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这是二位老师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新阶段新变化的认识，在中国乡村振兴



图1 第五届中国乡村文明论坛在长治振兴村召开，温铁军老师翻阅由我刊编辑的《乡村振兴学者视角（2018）》

基础之上所做的兼顾世界乡村复兴的升级版。在长治振兴村，我的乡村发展梦被这群学者和实践者点燃。

（二）一波三折乡建路

2019年很快就到了，期间我一边约稿启动变更刊名事宜，一边参与筹办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但乡建的这些老师们似乎对发表论文不太感兴趣，至少对在我们这样一本地方农业院校普通学报上发表文章不太感兴趣。发出的微信要么被婉拒，要么石沉大海了无音讯。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的事情进展也不顺利，期间开了若干次的推进会、协调会，但在山西，有中国两字已是很大的事情，带了世界，那还了得！我实在等不及了，2019年8月1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了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农业期刊分论坛。大会主席张孝德老师以“迈向新时代乡村复兴若干重大前沿问题思考”为题，从乡村振兴和复兴的关系、中国乡村价值和使命、乡村治理失灵的原因等十个方面进行主题演讲，内容深刻发人深思，受到与会农刊代表的高度评价。



图2 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农业期刊分论坛在中国农大东校区金码大厦召开

这一年，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没能开成。这一年，变更刊名的申请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无情驳回。这一年，圈子里一篇乡村建设者的稿件也没约到。临近年底，我和周立老师联系，再次羞涩委婉地提出希望能赐稿的请求。周老师没有直接拒绝，他告诉我常规的论文暂时还没有，但有个调研的随笔，看看感不感兴趣。

当1998年“锵锵三人行”开播的时候，我们萌发一个中国农村跨学科巡游的“三人行”主意。无奈，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有时间。延宕至今，发现欠缺的，只是一个决心。决心一下，应者云集。三人已是不足，遂有九人行也！中国发展经验，无疑是独特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乡土中国，已然转变为城乡中国的基本格局，让我们更需要在乡村发现中国。单一学科和单一视角，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终是井口那一片天。然一隅之得，亦可成就众人之识。多学科多视角的跨学科调研与对话，成为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和梳理中国农村基本经验与规律的共识。早萌的春芽儿，期待在夏日调研中绽放一树繁花。

干净！新鲜！对我这样一个早就厌倦了看八股文的编辑来说，这些小短文犹如涓涓清流沁人心脾。这是他们2019“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的篇首语，是以周立老师为首的9位学者在乡村调研后的随笔感悟。我当即决定，以共同作者的形式发表，放在2020年第1期的首篇。第一，这是一组随笔汇编的文章，没有参考文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章，更不是时下火热的农业经济类文章；第二，这是中国乡建领域最接地气的见解和观点，是来源于乡村的鲜活的案例和思考，不是书斋中做出的学问，不是闭门造车的堆砌；第三，最重要的是这是我喜欢的感觉，是为中国乡建研究保有的最珍贵的一粒种子，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洋洋洒洒几十个版面出去了，就等着评价的声音吧，大不了就发这一次，影响因子没那么重要。社会反响出奇地好，公众号同步转发的推送获得大量的阅读、点赞和评论，主编廖允成教授专门给我发微信表示赞赏。于是我又紧急联系周立老师，在第4期追加补发了他们2018年的行知录，并配发编辑推荐语如下：

周立教授团队撰写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9）》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一经刊发，在国内乡村发展研究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特此刊发该团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以飨雅阅。

此文是对中国乡村发展的纵深调研，打破常规视野中“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程式，一点触及，多点发力，多视角发现乡村中国的魅力，总结乡建历史和经验，传承乡村文化，开启城乡

中国发展的新研究时代，学者情怀贯穿其中，读后为之动容。至此，我和周立老师建立了频繁的联系。

2020年，终于发表了中国乡建领域的两篇汇编文章；2020年，终于召开了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2020年，温铁军、张孝德二位老师担任学报荣誉主编，周立老师担任副主编；2020年，变更刊名的申请再次被无情驳回。



图3 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在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龙城校区召开

庆幸的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结识结交了越来越多的以乡村建设为使命的学者和实践者，朋友圈不断扩大，其中包括给朱镕基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老师、小毛驴市民农场的黄志友老师、蒲韩新青年公社的梁少雄校友、北京品牌智造院的郭占斌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萧淑贞老师、西南大学潘家恩老师、行动源计划创始人张兰英老师等等等等。

2021年3月，接到学校通知到中国人民大学挂职交流。这是国家一流高校支持山西高校的一个项目，早已启动但搁置了许久，我迫不及待打包行李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中国人大的半年时间里，既随堂听了周立老师的课程，也参与过小范围讨论，更荣幸的是受邀参加“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2021年的活动。受疫情影响，活动已中断两年之久，大家都着急想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但一直等到12月底，疫情此起彼伏，这次调研也始终未能成行。倒是借着9月份的窗口期，第二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压缩规模又在太原召开了，会议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世界乡村复兴的中国实践。我们始终在各种质疑的声音中艰难前行，这注定是一条不寻常的路，是一条呵护火种的路。



图4 第二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在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龙城校区召开

（三）在屏南乡村发现中国

2022年7月的一天，接到周立老师来电，邀请我赴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四坪村，参加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组织的第二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周老师说，鉴于国内疫情形势，“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2022年活动同期在福建屏南举行，时间是8月5日到15日。这个时间正好跟学校的一个培训冲突，但我毫不犹豫决定赶赴屏南，毕竟这是期待了好几年的一场约定。接到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恩老师发来的邀请函，兴冲冲直奔福州长乐机场，下了飞机坐上研究院派来的车，两个多小时，高速完了盘山路，晕晕乎乎晚饭前终于赶到了四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近20所高校的30余位在读硕博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参加见面会。可能女孩的学习考试能力比男孩强，或者是女性先天性关注弱者关注家庭进而关注乡村，感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员都是女孩。我即兴发言：妈妈在哪儿，家在哪儿；女性在哪儿，希望就在哪儿。这么多优秀的女性投身到乡建领域，中国的乡村振兴必然是大有希望的事业。这倒不是我讨巧卖乖，是我近几年研究中国的乡村振兴，关注到女性力量在家庭延续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真实感受。潘家恩老师说乡村振兴研究院的定位是：扎根四坪，立足屏南，放眼全国，国际视野。至少，从学员构成上来说是基本实现了。这是中国乡建领域真正扎根在乡村的研究队伍，从见面起聊的就是工作，一直到夜里十点多，意犹未尽。散会后继续组织小范围讨论会，研究在四坪如何进行“三变”。快十点半时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门口突然传来一声高亢清脆而又婉转多变的女声：周老师，您看谁来了。我挺纳闷，

这是谁？

宾主相见分外欢喜，相拥握手快速切入话题，是屏南县政协原主席周芬芳，也是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副院长。我后来知道，周主席是屏南传奇式人物，由“黑五类”家庭子女起步，做过中小学教师、乡镇干部、副县长、宣传部部长、政协主席，是土生土长的屏南基层干部。主编完成《乡土屏南》，说起屏南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潘家恩老师说她是屏南活字典，是祖母级人物，我觉得未来她极有可能被誉为屏南女儿。在后续调研的日子里周主席既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快乐，也给我们传授了无数的知识。



图 5　和周芬芳主席、周立老师、吕永清老师在邱家姐妹花的南湾农场

周主席说：有“病”者，事竟成。在屏南的 7 天时间里，见到了好多被世俗的眼光认为是有“病”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执着和坚守做成了事，以至于我也迫不及待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成为一名“病”人。被称为传统村落文创设计奇才的林正碌先生、被误认为是欠款躲债的曾伟老师、放弃城市生活驻地中国美术学院乡土学院的陈子劲老师，他们都以独有的方式在守护乡村最后的家园。陈子劲老师的工作室坐落于屏南前汾溪村，这位个性十足的艺术家不屑回答他认为无意义的问题。看到他像个孩子似地一路小跑招呼大家，看到他送别我们时孤单的身影，我突然想：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大军中，真正扎根做事的却都是这些率真的人。

周主席说：有时候一个人就是一项事业。在屏南的 7 天时间里，我住在香港来四坪村创业开民宿的苏先生家里，苏先生不仅是四坪新村民，



图 6　调研团队和陈子劲老师在中国美术学院乡土学院，这是一块土夯的校牌

还是村委会副主任，经营的松韩屋是纯木质结构的三层小楼，精致而有情调。房间里挂着两块牌子：人生如戏，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在度假中创业，在创业中度假，愿您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留遗憾，如果遇到请珍惜。我想，苏先生应该是遇到了。



图 7　苏先生来自香港，是四坪新村民，任村委会副主任

周主席说：锄头里挖不出共产主义。在屏南的 7 天时间里，我们见到了能写会画的返乡青年潘国老，“我在屏南有亩田”的邱家姐妹花，还见到军人转业回乡担任村支部书记的谢桂塘。为了下地劳动方便，谢书记常年穿一双雨鞋，我戏称他为“雨鞋书记”。这位 88 年生的年轻人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参军之后转业回乡，聊起自己的家乡和事业时声音洪亮激情澎湃。如今既种地，又养猪养牛，除了嗓门大有点法律人的自信

外，已经完全看不出是个大学生了。



图8　雨鞋书记毕业于闽南师范学院法律专业，如今是养牛养猪大户

周主席说：蘑菇红云冲天起，人换思想地换砖。该回家了，起个大早随了韩导团队如约访谈大海。大海是返乡创业的退伍军人，已经习惯了长枪短炮对准自己，面对镜头自信地喊：“喝四坪窖藏酒，交四海好朋友。”韩导说：“不错，不错，再来一遍。”



图9　大海曾在山西大同某部当兵，退伍后返乡创业，酿造屏南黄酒

等车时，突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大哥哥，你买我们家的李子吗？”小姑娘热情地看着我。这个只有7岁的孩子跟随父母在福州上学，正在度暑假的她特别热爱自己的家乡。“你为什么喜欢呆在村里？”“因为这里有我的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呀。”

血缘、亲情、记忆、童趣……许多的要素立体综合整全地构成乡土中国的乡愁。哪里是简单粗暴做5个方面就可以全面解决问题呢？乡村振兴，激发出所有在乡人的活力才是根本。送我到长乐机场的张师傅聊起自己的村落来满是自豪，各种数据典故信手拈来脱口而出。我问他车上挂的花花绿绿的饰品有什么讲究，他回答：没什么讲究，就是自己喜欢，看着开心。

开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其实不是件简单的事。林正碌先生、陈子劲老师、曾伟老师、梅庄主、雨鞋书记、大海、潘国老、苏先生，甚至包括周芬芳主席，这些人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吧？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拯救并激活这些古村落，形成特有的屏南现象和屏南速度。

周主席说：过去的屏南，又贫又难；现在的屏南，有点名堂；将来的屏南，赛过江南。我已经是四坪村的云村民了，屏南的赛江南，自然是我所期待的。但我的山西，我的故土呢？八百年的村子对周主席来说已是古村，二百年的房子被拆了都觉得痛心，听闻万安桥被烧毁时周主席潸然泪下，几天都缓不过劲来。山西呢？五千年农耕文明留下多少古村落？或被拆，或刷白。拆了建，建了拆，硬生生新堆起太原古县城来，牌匾上连落款都没法写。

以周主席为代表的领导干部所营造出来的优势凸显的政治生态环境，这应该是屏南能够抢抓文创机遇，“艺”想天开，快速激活古村落保护活化利用的秘笈吧。飞机经停武汉，在本该到达降落的时刻再次起飞。所有路过都是异乡，再晚点也得回家。出租车司机停好车，我在小区门口吃了一碗炝锅面。整整8天了，没有吃过这倒一股醋嚼一瓣蒜蘸点辣椒让人浑身冒汗的山西面了，还是熟悉的味道，汗倒不全是辣出来的。在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践行地福建省，在形成《摆脱贫困》重要思想理论的宁德市，在乡村振兴活化实验的屏南县，跟随“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团队的脚步丈量大地，我再次坚定自己的信念：尽自己所能，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这簇中国乡建的火种。

（初稿成稿于2022年8月31日）

三、潘家恩：“共情”之理解

两年前，在屏南四坪古村的一栋老房子里，我给《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写了题为“不是辩护的理解”之后记。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曾经“空心”的古村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和学者，大家一起在乡村发现中

国、在乡村建设中国。如何理解百年历程中的乡建和新时代下的乡村，如何在“再乡土化”中创造出不一样的知识，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这也是我在过去二十年中遇到的困惑，希望在此做些探讨。

（一）从“同情”到“共情”

大家都知道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同情之理解”，这个说法估计大家在很多地方都听说过，但我认为光有“同情之理解”还不够，因为所理解的内容很多时候仍然只能作为我们的对象。而“共情之理解”，意思是我们应该在某种意义上去挑战“对象化”处理和“客观/中立”假设，而“客观/中立”背后则是实证主义。我在长期的乡建实践和研究中发现，不少学术研究以及媒体表达看似中立客观，但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自己的立场，虽然其常常很隐蔽地说出一些精英的、外部化的结论，而真正的农民和弱势群体在其中常常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我觉得类似处理常伴随着另外一个问题：就事论事。实际上，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很多微观实践背后都有更大的脉络，其充满着复杂性和丰富性，但这些又都不容易得以真正呈现。英国的雷蒙·威廉斯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发展了文化唯物主义并提出“情感结构”这一关键概念——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理解情感以及情感背后的社会结构？我们怎样把情感和社会结构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认识？

我认为这对我们反思因过度学科化而将彼此联系的事物人为割裂的常见处理是有用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乡村建设中的各种现象，以及为何乡村建设实践中各方观点虽然不同但却能殊途同归；或者我们都朝着相同的目标努力，但实践内容和结果却充满差异；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其实还算努力，但却常常捉襟见肘并充满尴尬……其中存在着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需要如何进行理解？我们需要把乡建进一步打开！如何做，下面说下我的处理方式。

首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超越于一般的“好人好事”叙述？百年乡建史不能停留在“好人好事”层面，但如何做到，是需要一套方法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自觉。在这一点上，我想举一个关于晏阳初所提及“愚、穷、弱、私”的例子，有人类学者对这一常见论述进行反思，认为其把农民“问题化”了，关于此点，乡建团队也有过反思，但我认为我们仍然要对此类批评进行再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以“后见之明”去理解前人，而需要将他（她）们的言行放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脉络之中。比如，晏阳初所痛心的“愚、穷、弱、私”时代，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同一个时代，“恨铁不成钢”也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罢，需要对那个时代进行“同情之理解”，但那个时代同样又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同样不能以“愚、穷、弱、私”标签化晏阳初，其不利于对他进行更为脉络化和整体化的认识。若拉通来看，我们一方面看到晏阳初批评农民“愚、穷、弱、私”，但另一方面他也在批评知识分子的“精英化”，批评现代教育与现代知识无法服务乡土，所以才要进行改造并付诸实践。实际上，纵看晏阳初的百岁人生，他在不同时期的认识观点也在发生变化。我说这些话的意思不是为晏阳初“辩护”，而是想说，无论晏阳初还是当代乡建，其实都充满着复杂性，都是特定历史脉络的体现。

其次，我认为从“同情”到“共情”，需要强调更容易被忽略和遮蔽的“人”。我们都知道温老师提“三农”问题，其实隐含着一个批评，只谈农业问题的时候某种程度是“目中无人（农民）”的，如果没有农民的尊严劳动与农村的稳态治理，何来农业的安全可持续？所以温老师希望从“一农”问题扩展为“三农”问题，并主张把农民放在首位，但要真正做到，还存在很大困难。

此外，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离不开与人打交道，访谈是基本方法，但会发现很多写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人，还是非常冰冷的东西，而且即便有人，你会发现这个人常常是别人，怎么把别人变成包括自己在内的“活人”和“整体的人”，这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事情的好坏对错，每个人也都有他（她）的喜怒哀乐，乡建就更加明显，相信大家都能确确实实感受到当中的酸甜苦辣，既有欢笑也有泪水，既有兴奋也有无奈。我们如何通过其中的复杂与张力更好地理解乡村建设，同时反思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书写？

再次，从“同情”到“共情”，内在着微妙

的立场差异。今天我们回避立场那是自欺欺人与掩耳盗铃。虽然我们不应从字面上对“同情”进行简单化理解，但仍然要看到，“同情”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的角度，而乡村建设更强调平民立场和自下而上的推进方式，无论历史还是当代实践。正是这种草根和平民的立场，让当代乡建穿越时空的与历史乡建发生共鸣。举个例子，我读梁漱溟开始的很晚，也没有什么研究上的积累，但却读出一些可能容易被忽略的洞见，比如梁漱溟说近代中国更内在困境是“他毁＋自毁”，近代中国是一部“百年乡村破坏史”，他还说，我们乡建人之所以这么难，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想着以多数人为重，也正因如此，恐受多数人之累……当我读到这些观点的时候，深以为然。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共鸣？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乡建实践者，这些问题困惑同样也是我们的苦恼和感悟。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读法，其实是源自相似的角色与工作内容，其容易产生某种共情，也更容易让我们走进梁漱溟的思想世界。

（二）理解何以可能

上面谈了“共情”，下面谈谈“理解”。这个理解不是“理解万岁”意义上的理解，我想简单阐述下理解如何成为可能？

第一，我们应该有一种话语上的自觉。我们希望能推进对乡村建设的理解与新知识生产，它既不是“好人好事”，也不是“就事论事”，更不是“成王败寇”。那怎么做到？我认为一定要“跳出乡建看乡建”，也就意味着需要有一种整体性视野。钱理群老师给《回嵌乡土》写的序言中提出要对20世纪中国历史和经验进行再理解，也就是说应该把20世纪打通，同时看到乡村建设和乡村破坏之间的因果关系、乡村建设和中国革命之间的缠绕关系、乡村建设和国家建设之间的总分关系。总之，它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第二，我们需要有一种自觉，让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尽量契合研究内容，尽量避免削足适履，以有助于对乡村建设进行更为整体动态的认识。除了材料和观点，叙述形式也非常重要。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按照平常写学术论文那种方法当然也能完成，但就像我上面说的要反思“客观/中立”，按照那种方法既不利于体现这些反思，也不能把我希望包含的复杂情感与喜怒哀乐写进去。最后决定尝试一种“共情”的新写法——全书开头是当代乡建实践者孙恒创作的歌曲选段，书中每一章节的前面我都用上两段题记，那是历史乡建前辈或当代乡建实践者反思感悟的两段话。然后在每章前面加一个小引，以我自己参与乡建的故事和反思开场，与正文内容构成互文关系。为何要书写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不可能真的变成梁漱溟或晏阳初，无论进行怎样的了解，那也只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想象与猜测，相比之下，我比较有把握的是讲自己，不仅包括具体参与的乡村建设实践，还包括兴奋、困惑、无奈、期盼等内在的情感与反思。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把乡建里边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反思性体现出来。

第三，我觉得“理解”要真正发生，还需要突破心理上的一关。2008年，当同仁们正在北京郊区艰辛地筹备小毛驴市民农园时，我在香港读书，心里很纠结，总觉得自己像个“逃兵”，一直过意不去。这个时候刘健芝老师鼓励我，说我在香港读书本身也是一种乡建。在写作博士论文（《回嵌乡土》初稿）时，内心还有个顾虑，我们作为当代乡建的当事人，这场未完待续的实践还在继续进行中，该不该“真写”和“实写”？特别是内部的张力与反思，其对实践是有益还是干扰？老师们鼓励我说若要在叙述层面对乡建事业有更大贡献，反而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事，也就是说不是要“评功摆好”，这也提醒了我放下心理包袱。同时我们要努力摆脱各种二元对立思维，我们所努力的生态文明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打开乡村建设的丰富性。鲁迅曾经提出“横站”，其在现实实践中也常是“左右开弓”，而从历史到当代的乡村建设也都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一直面对着不同立场的批判与质疑，因此也常常“左右为难”，如何“小心翼翼”却“充分自觉”地突围，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新的可能则成为乡建叙述要努力的方向。

第四，前面讲了理解的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能为了理解而理解，而是要让理解成为乡建实践的一部分。就像马克思说：“重要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毫无疑问，乡建的目标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研究所一直强调对当下社会实践的

“批评性介入”就与之内在契合，我们不是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而是为了更整体地把握这个社会，通过介入社会实践而促进社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第五，若要让理解成为可能，我们还需要有充分的国情自觉与乡土自觉。若竖看百年乡建史，从张謇、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再到温老师和我们这群实践者，相通之处是国情自觉和乡土自觉。何以见得？张謇当年曾被讥以“村落主义”，他却认为即使被嘲笑，也必须承认乡土就是中国的底色与突围之道。而梁漱溟所实践的“村学”、“乡学”也可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教育与组织方式的自觉，特别是他在《中国民族之最后觉悟》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两条“走不通”道路，而乡村建设正是他希望探寻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其中充满自觉。费孝通就更直截了当了，当大部分人去谈一般工业时，他谈乡土工业；当其他人主张城市化时，他提倡“小城镇、大战略”……为何如此，他曾说：“我知道（这些）是不够漂亮，不够生动的，但是在这乡土中国，漂亮和生动常等于奢侈。”可以说，这些先贤所内在体现的国情自觉与乡土自觉延续到温老师及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者身上。如何把这种自觉进一步体现在现实实践和话语生产中需成为我们的努力方向。而且这种自觉还应该是双重的，不仅要扎根本土，强调其中的特殊性，同时还应该有全球视野，就是把中国置身于20世纪全球剧烈转型之中进行理解，而不是闭门造车，就中国谈中国。

最后我想说，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变了，而且变化非常大，现在很多干部群众已经主动起来从事乡村建设了，我们不能“叶公好龙”，而要及时跟上。现在已经进入“全面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可谓百年来乡建乡贤及当代乡建同仁长期艰辛努力的结果，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顺势而为且有所作为。最后，钱理群老师在给《回嵌乡土》序言中讲到他的最后期待：“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理论。”希望以此与大家共勉！

四、王松良：在屏南与新农夫们一起学做生态农业

（一）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严峻的挑战，人们不得不因此改变计划，对我们几个学者启动于2018年、计划每年一度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联合调研亦然。

2019年暑假，我刚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归来，即响应中国人民大学周立、西南大学潘家恩两位学者的召集，参加第二届“在乡村发现中国”西南三省（重庆、贵州、云南）之行。行程结束后我写下一篇生态经济学随笔，以大理的“风”“花”“雪”“月”地理景观象征不同类型的“新村民”构成的人文景观，他们是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的绝佳平台。由于突发而来的新冠疫情，原计划2020年暑假的东南三省（江西、福建、浙江）之行搁置了2年之久，给我个人继续发现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之旅一个不小的打击。

实际上，新冠疫情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的大舞台！首先，新冠肺炎是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互动的一个不良反应，是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但也创生了人类与自然重新对话的机会，启示人类再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其次，新冠疫情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化与在地化的辩证关系，启示中国与世界的对话需要升级，警惕泼洗澡水连小孩也泼掉；第三，在新冠疫情面前，我国的城市与乡村也需要重新对话，与其说乡村单独振兴，不如说城乡融合发展更为合理，因为城乡（人文的和地理的）景观是不能分隔的。

总之，新冠疫情给了我们重新计划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对“在乡村发现中国”事业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决定借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举办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之机会，不同学科的学者朋友聚集在屏南县四坪村，携同来自全国大学的28名硕博研究生一起学习，大家从各自的学科视野出发，重启“在乡村发现中国”。而我，则藉此思考着这两年来与屏南乡村的“新农夫”们一起学做生态农业的经历，体会自己从高校书斋里“教授”到乡村田野“草根”的“蚕变”过程。

（二）

屏南是我国东南沿海丘陵区一个典型的内陆山地小县，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这里山峦连绵，平均海拔830米。在工业文明时代，由于资源禀

赋不足，没能让工业经济超越农业经济，但却让农业走上资本化、工业化、化学化之路，以大力发展花椰菜为主的经济作物替代了粮食作物，以大量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等工业、化学品的投入维持着每亩2万～3万元的土壤生产力。其结果，一方面，土壤结构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在地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在转型生态文明的时代，屏南决心把真实的“绿色青山”变为真正的“金山银山”，自2017年以来，走上以实施村落“文创”助力乡村振兴之路，在全国取得一定影响。2020年11月县委县政府与省内外三所高校在四坪村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尝试通过发挥后者的智库作用，指导乡村在“文创”基础上，发展“农创”，均衡推进乡村产业兴旺。

不管是“文创”还是“农创”，人才都是第一要素。“文创”的人才来自全国各地纷涌而现的“新村民”，“农创”的人才称为“新农夫”——区别老一代农民。这两年，我在屏南和这些“新农夫”们一起学做生态农业，发现致力于“农创”的三类“新农夫”，即城市大学生“新农夫”、返乡青年“新农夫”和在地转型“新农夫”。

“90后”的江思林是城市大学生“新农夫”的代表。生活在屏南著名“文创”村落龙潭村的江思林拥有“新村民”和“新农夫”两种身份。2014年福建农林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江思林，不想浪费四年国家和家长给他的农学专业学习投资，决心致力于“三农”工作，先是在福州郊区同专业毕业的学长魏长的社区支持农业家庭农场实习了一年，而后加入福建的乡村建设队伍，在福建省连城县的培田村从事自然教育，2019年与妻子张小燕一起落户龙潭村，共同经营了一个称为“燕窝”的民宿。从2020年开始，江思林在村里流转了2亩稻田，种植当地常规稻，稻谷产品全部被龙潭村的“新村民”提前预定。今年他加入“粮食安全屏南行动”先行者队伍，把稻田面积扩大到了7亩。

在大学时代，江思林修读我主讲的《农业生态学》专业必修课，这也许对他坚定选择服务“三农”和绿色农业道路有一定的启迪，但他现在从事的稻田生物农作体系不是我指导下进行的，相反，每次带学生到龙潭和他交流为农心得，却成为我的“必修课”。



图1　在秋熟稻田中的江思林（黄旭丹 摄）

“80后”的潘国老是返乡“新农夫”代表。出生在屏南县熙岭乡四坪村的潘国老，在老家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20多岁时到城市打拼。在2021年回到四坪村做“农创”之前，潘国老在广州已经拥有自己的超市。2020年年底，潘国老听说家乡成立了由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领衔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就抱着好奇的态度回村听研究院召集的爱故乡座谈会，看着学者专家们的热心和努力，他心动了，毅然放弃广州的超市生意，回村带头成立屏南爱故乡生态农业合作社，从事基于四坪村独特空间资源的“文创”＋“农创”＋“星创”＋“云创”。其中的“农创”是指基于四坪村70多亩稻田的生态农业——一种不用人工合成的农药、用有机肥代替化肥的安全水稻生产体系，一种采用稻田养鱼、养鸭等的农牧结合型生态农业体系，以及一种由杂交稻、常规稻、有色稻混合的稻田生物多样性体系。

尽管从2021年一开始我参与指导了潘国老构建基于稻田的生态农业体系，但不得不说潘国老是学习能力极强的返乡“新农夫”，今年他可以把生态农业的知识体系拓展到水稻博物馆、林下经济（种植灵芝、养殖蜜蜂等）等新业态的创建和经营上。

“70后”的郑振如是就地转型“新农夫”的代表。世代住在屏南县屏城乡前汾溪村的郑振如一直对生他养他的土地不离不弃。他从20岁开始就老老实实地跟着老父亲耕田，迄今已有30多年做农民的历史，从没有被城市的“精彩”吸引，坚守者农村的男耕女织传统，和妻子两人耕作8亩的稻田，还利用村公共林空地养着20多头牛，供着2个上学的小孩，也算丰衣足食。2021年在落户于本村的中国美术学院校外实践基地“乡野



图2 2022年，返乡“农创”青年潘国老迎来又一个丰收季（陈玲琳 摄）



图3 郑振如与前汾溪村乡野艺校创始人、中国美术学院的陈子劲副教授在田间（毛华磊 摄）

艺校”的带动下，振如的8亩稻田也采用了有机肥，并用家里20多头牛的牛粪肥田；也不用化学农药，而是通过稻田养鸭防治水稻病虫草害。今年响应“粮食安全屏南行动”，流转村集体收储的40亩稻田，继续自己“发明”的稻田生态农业模式。

郑振如是个话虽不多，但行动和学习能力都很强的就地转型“新农夫”。作为所谓“指导教师”的我，并没有把我在“乡野艺校”试验田那一套严格的生态农业程序强加给他，相反，我十分尊重他的意愿和选择，比如，我建议他做稻田养鱼，他却说，这里的稻田不适合养鱼，适合养鸭，那就养鸭！我由此从他那里学到更为落地的生态农业技术。

（三）

在屏南乡村振兴的人才回流过程中，无论是代表城市大学生“新农夫”的江思林，还是代表返乡“新农夫”的潘国老，抑或是作为就地转型“新农夫”的郑振如，他们都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真正需要的人才，他们为“无人的乡村如何振兴”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学习新视野，形成新动力”是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他们的涌现启示着位于城市的涉农大学的教育转型方向。

一是基于新农科建设战略构建融合生态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体系，作为培养“爱农知农”人才的平台。“立德树人”是每一所大学的根本目标，关键在于如何衡量“立德树人”。2019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强调“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明确了涉农高校“立德树人”的具体内涵。随后教育部积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相继通过“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启动“新农科建设”，广大涉农高校也迎来向新农科教育转型的重大挑战。实际上，乡村振兴就是新农科建设的大舞台。具体到本文主题的生态农业人才培养上，广大涉农高校需要将农业生态学与乡村社会学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称为“乡村生态学”的新学科，乡村生态学将按照生态学的学科范式，从生物组织等级和地理景观尺度的生态学视野和方法论，依次从承认和兑现农业（乡村、农民）的多功能性价值、改革农民的组织程度、变革农业资源的利用方式和革新农业的技术，以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生态系统，让后者与可持续的城市生态系统融合，促使城乡之间生态要素的双向有序流动，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把农科教育从大学校园延伸到乡村田园，作为培养“懂农能农”人才的舞台。以本文谈及的“涉农高校农业生态学理论创新与乡村生态农业实践经验的互动”为例，目前，涉农高校依然是延续习惯的基于实验室研究的人才培养体系，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需要的综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生态农业的技术推广有相当大的距离，这种“研究－教学－推广”体

系是单方向，且效力是逐步缩小的。如果能把学生带到乡村田间地头，从与新老农夫的实践与学习中获得经验，再回到教室和实验室里学习农业生态学知识和技术，不仅能培养出乡村振兴需要的综合应用型人才，反过来能为涉农高校的新农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及教师评价体系的革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2020年，笔者启动“草根教授”计划，借助于与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合作的计划，借所谓“指导”的角色，把与新农夫们互动学习获得的生态农业落地技术，回到大学的课堂上对自己主讲的“农业生态学”课程进行改革，创建“参与式”和“研讨式”课程教学体系，也借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绿色发展的大好政策，带领本科生、研究生到本人参与创建的几个县域（包括屏南县）生态农业基地。通过这样的努力，尝试引导农科高校从探究学术向应用学术、教学学术和整合学术多元转变，为抹平教学与科研鸿沟、推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和高校教师综合评价改革提供个人案例。

五、韩君倩：从“乡愁”到“乡建”

2022年8月5日，《探·中国百年乡建》摄制组一行来到掩映在崇山峻岭下的福建屏南的一个古村落——四坪村，“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在四坪村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乡建展室开营，来自全国多所大学的钟情于乡建的硕士生、博士生们相聚在这里。“走进乡土读懂中国”、“在乡村发现中国”，这一题旨也贯穿于我们创作团队多年的创作中。自拍摄系列纪录片《乡愁》以来我的视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漂泊在城市的打工者和留守在乡村的农民。“乡愁”一直以来是作为创作者的我一以贯之的情结与情怀。转型期中国的打工者大都来自于乡村，这个群体人数众多，为他们述说，为留在土地上和漂泊在城市的农民述说，是艺术工作者应该为这个时代承担的表达责任。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人从9亿到12亿这个阶段，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农民为主体，而是重工弃农，以城市的生态观，西方工业化模式在治理乡村，以至于今天乡村完全失去生态平衡”。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中国“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时期。乡村日趋凋敝，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乡村里剩下的主要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关注乡村，关注乡村里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在城市的打工者的命运很快进入了我和我的创作团队的视野。

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
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和映照的国度
累积200多天的《乡愁》片拍摄
历时四年的呕心沥血
一次电影的田野调查
一个中原村庄的社会学文本
一份镜像呈现的国情考察
一部“乡土中国”的叙事曲



图1　乡愁

在拍摄中我们问到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对未来的期许，他们大都渴望能尽快回到家乡，在家乡的土地上发展，哪怕挣的钱少一点，但不再“骨肉分离”！中国人浓浓的乡情乡愁都蕴含其中。

2017－2019年我有机会去做《乡愁》的姊妹片——故事片《七声》。《七声》依然秉承了我一以贯之的“乡愁”情结和情怀——依然是关注普通人，关注来自乡村、穿行在城市的打工者。关注时代变化中小人物的命运，关注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轨迹。这两部不同片型的影片互为映照——一部内涵上紧密相连的作品，我们再度关注来自乡村这个群体的打工人在城市的生活。当下中国的电影银幕上太缺少劳动人民的形象，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或者说是一个空白，需要有创作者来填补，以传递出一种直面现实人生的穿透力量。

“乡愁”是凝聚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之一，

在乡村日趋凋敝、城镇化快速发展的21世纪，“乡村再建”已经迫在眉睫。几千年来，乡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和历史，叙写着中华文明的风貌与肌理，乡村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百年乡建，起步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的建国历程相伴于举国体制的乡建。张謇、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展云等先贤的名字在中国的乡村建设的画廊里熠熠生辉。改革开放到新世纪，乡建人再次启程，乡村建设行动已经开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建设代表的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大众广泛参与，和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充满多样性的实践。中国的乡村建设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是百年来知识分子凝结的“乡愁”，“在以农业为基础繁衍生息的中国，乡村建设是不言而喻的立国根本”。正如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回望百年乡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以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进行梳理，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中国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自《乡愁》在央视播出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后，“乡建”纪录片的选题就一次次走进我们创作团队和该片在央视的制片人德宏的视野，并就此展开了多次探讨。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以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内涵最为丰富的国家战略方向。“乡村振兴是我们应对全球化的压舱石。”这是温铁军老师的至理名言。温铁军老师是中国乡村建设的领军人物，学术引领与躬身力行相并行，是乡村建设知行合一的典范。他和他的乡建团队已是闪烁在中国大地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壮阔的燎原之势。拍摄《乡愁》后期我们就知晓温铁军老师和他的团队在组织大学生支农队下乡参与乡村建设，甚为感动。温铁军老师带领下的这次乡建行动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第六次下乡运动”，也即“新上山下乡运动”。著名的学者钱理群教授说“‘第六次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不同是这次行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自发行动，并内含对当今教育体系的挑战和创新”。这一代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寻找、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促进着农村的变革。因此，这或者可以称为一场“双向精神扶贫”运动。乡建中心的工作重心一是对青年乡建人才的培养，二是激发农民力量，推动农村多种经营发展的创新。乡建团队秉承“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如温铁军老师所希冀的：“吾辈不求回报，但求国仁永续。唯愿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其中的乡建事业，在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中一代代传承下去。”

对此我们一直予以致敬和关注，2022年初在东方出版社的丽娜和袁元的引荐下，我们有缘与温铁军老师的弟子董筱丹、潘家恩相识。说起乡村建设，大家的心一下就靠得很近很近，很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也由此开启了我们和温老师的团队共同筹划百年乡建纪录片之事。记得最初跟董筱丹老师沟通乡建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她曾把温铁军老师的意见转告于我们：从《乡愁》到《乡建》，很好啊！百年乡村建设，温铁军老师的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实地调研和学术研究，给予我们的创作以极大而丰富的滋养。在策划“百年乡建”纪录片的过程中，深感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可能需要我们用一段时间来完成。既需要留下先人先贤的乡建功绩和他们的述说，也需要记录下当代乡建人的薪火相传和国家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个个乡村的变化轨迹——这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要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全面而完整地表现百年乡建，这部系列片是第一部。历史性、当代性与开创性兼具，所以说它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很有人文价值和史诗性的大型影视作品。

陕西留坝曾是国家级贫困地区，以温铁军、董筱丹老师为主导的中国人民大学乡建团队帮助留坝县全面实现乡村善治，走产业兴旺、三产融合、城乡融合之路。2022年7月1日我们摄制组在去往留坝县城的车上，在和温老师交流乡建的过程中，《探·中国百年乡建》的拍摄就正式启动了。感觉和温老师的交流很酣畅，好像我能随着温老师的乡建脉络进入或者说一步步走进他的中国乡建视野。当然我主要是一个认真的聆听者、学习者和提问者。我们的《探·中国百年乡建》系列片的策划案得到温老师的首肯这也让我们很欣喜。接下来的几天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



图2　对话温铁军

兼程来形容温老师一行在他们乡村振兴的多个点儿进行的考察和调研。路上遭遇泥石流冲垮路面车辆无法通行时，温铁军带领团队成员走在泥泞的山路上，他团队中的很多青年学子都走不过当过兵、下过乡的温老师，我们摄制组有时也会跟不上他有力而快捷的步伐。

在拍摄中温老师很能体恤我们摄制组，同时发出他的感慨：你们这是个体力活啊！有时会停下来等我们，有时会在跟我们的镜头交汇时说出那种很有现场感、同时也很有分量的话。他的得意弟子董老师也曾很感慨地跟我说：你们纪录片的工作方法跟我们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很像啊！我也很有同感，是啊，其实纪录片的拍摄跟他们的社会学调研采用的都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方法，而且都深入且细致。

留坝火烧店镇的“三农书院”举办了一场温铁军老师与三级书记的对话，现场反响很热烈，我们也由此认识了三位与温老师对话的乡村党支部书记，并跟随这三位书记走进了他们所在的村子，领略一线的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

离开秦岭南麓腹地的留坝我们来到重庆武隆，重庆武隆的乡建是温老师和他的另一个大弟子潘家恩——西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的副院长和其团队共同策划与跟进的。在拍摄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乡村振兴一定是从上至下的齐心协力才能达成。温老师的学术团队、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与武隆区委的领导和武隆石坝村的村级领导的目标一致——共同谋划武隆的乡村振兴蓝图，同心同力方能拧成一股绳，基层党员干部也发挥着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知识分子在其中继续发挥着“助产士”的作用，践行知与行，在乡村发现中国——这也许正是今日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最佳对接。可喜的是因为“乡建”的感召，又有一些有激情、有情怀的年轻的创作者加入《探·中国百年乡建》的创作队伍里来。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成了参加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开营的学子们共同的心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罗建章博士作为营员代表，深切表达了硕博研习营可以给青年学子带来的收获：“三个一”，即提供一个“在乡村发现中国”的平台与机遇，种下一粒百年乡建的种子，成就一段乡建路上同行的情缘。我们摄制组全程参与了这次以“在乡村发现中国”为主题的学习与调研。

“第五届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论坛”2022年10月在中国乡建集大成之地的重庆北碚举办，我们摄制组一行穿越乡村建设的历史隧道，探寻“乡建四杰在重庆”的高光时刻，走访乡建路上的重庆东温泉镇的鱼池村，感受早期乡建与今日乡建的一脉相承，并在重庆北碚、合川，寻访了三位年龄加起来有297岁的1944级的中国乡建学院的老校友，毋庸置疑这是一次抢救性的拍摄和记录。“抢救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与“启示未来”。

在屏南的“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和西南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的“乡村与我们”的放映现场上，呈现时代洪流下小人物冷暖人生的电影《七声》与观者的互动很热烈。学子苗苗在她的

《从〈七声〉破镜而出》的影评中这样写到：“即便这样一部很温暖的电影，看完后，却有一种读鲁迅杂文的感觉……”“韩导的悲悯与同情流淌在每一个镜头里，但每个温情镜头轻轻触碰的却是无比坚硬的社会现实……”“诸如阶级、性别、就业、青年人的出路、工伤、流动子女读书等在后疫情时代赤裸裸呈现的坚硬问题。”跟主人公毛果有着相似身份的学子们从中发现了与之相似的“共情”——“应该将共情投入乡村的展示与记录中”，并引入到对乡建的思考：“乡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乡村。”“这次放映与研讨是‘西南大学创新研究 2035 先导计划：乡村振兴中国道路行动’内容之一，也是贯穿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乡村振兴的举措。”即将公映的《七声》也将是灾后疫情时代对劳动者的一次倾情发声。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华夏大地每一天都谱写着它不一样的昂扬与力量的歌谣——我们在乡村中重新发现中国、认识中国。

（2022 年 11 月 北京）

六、王玉：一个人的乡建史——与周芬芳对谈有感

周立曾这样阐述在乡村发现中国的意义：“在乡村中发现中国，发现中国的多样性，发现中国力量，发现中国道路[①]。”而我们能在乡村发现的中国力量之一就是乡建的实践者。乡建已经有百年历程，而一个人的生命也不过百年。乡建过程中，有专家、学者去指导，更多的是基层干部去实践。我们可以在乡村发现乡建干部，发现他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周芬芳就是一个基层干部，大家现在都亲切地称她为周主席，不仅仅因为她曾经担任当地政协主席。“主席”这个词在中国乡村中一直有格外亲切的意义，一个人被大家承认并且如此称呼，足见她已经走进每个村民的心里。

关于乡建，孙歌关注的是如何“让乡建从‘有实无名’走向名副其实”，具体而言就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有没有内在机理？理论与实践存在什么关系？[②]”之类的大命题如何从乡建的实践中得到某种答案。基层干部作为这段历史的直接亲历者，在给出答案上不像学者那样需要“下乡”沉潜，他们本身就生活在



图 1　2009 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成功

乡村的深处，本身的生命就沉潜在历史的深处。作为一个生长在乡村的基层干部，周芬芳生于 1959 年，已经年逾六十。这六十年，她都处在新中国的乡建中，她的生命史就是她所在故土的生命史，而在她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刚好也是乡村巨大转变的节点。用一个基层干部的生命去看待乡建，用一个基层干部的成长史去看乡建的成果，除恰切之外都是活泼泼的乡土气韵和最真实的乡村图景。而孙歌提出的历史书写、内在机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能在众多如周芬芳一样的基层干部身上得到来自乡土社会肌理内的一种答案，这也是我们“在乡村发现中国”的一个答案。



图 2　2010 年荣获中国古村守护人

① 周立，张艺英，张慧瑜，等.“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18）.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20，19（4）：1-32.

② 潘家恩 . 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推荐语 .

（一）从“布鞋”走向“皮鞋”

还没见周芬芳主席这个人，就已经在潘家恩老师那儿看到一段周主席扛着锄头唱着歌的舞蹈，她的歌唱得自然，虽然已经是一个基层干部，年过半百，但锄头扛起来得心应手。晏阳初在讨论乡建的时候曾经有个观点“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意思是学者先从自身的“农民化”贴近农民，才能够在思想上实现乡建理想。也就是一些学者[①]认为从衣着上“皮鞋”走向“布鞋”，而周芬芳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她是从“布鞋”走向“皮鞋”再回归“布鞋”的，她的锄头，自然扛得起劲儿，那是她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她父母是老师，全家住在一所充满文化气息的祖宅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祖宅的雕梁画栋上满是二十四孝的故事，这是中国乡村宗族社会的根本，就是孝亲文化。既然父母是老师，那么周芬芳出生应该是从“皮鞋”开始的，但她出生后不久，父亲被划定为“黑五类”，父亲不忍家人受连累，甚至让母亲将女儿送人，带着儿子改嫁。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中，母亲也没有同意，而是历经风霜在夹缝中独自抚养儿女。这种家庭变故反而成就了她留着“皮鞋”先穿“布鞋”的生涯——思想上有父母影响，并非一个地道农民，特殊时期只能先将“皮鞋”留起来；生活上，她体验乡村生活的种种鄙陋，甚至还不如一个一辈子只穿“布鞋”的人过得体面。她对于乡村的理解和未来参与乡建的思想基础，相较于很多学者囿于城市经历的“先天不足”，她是得天独厚的。

周芬芳童年经历过羞辱歧视，也感受过底层温情。她险些成为“童养媳”，见过父亲“炒衣服”，靠着“挑黄豆”打发时光……因为身份，她受到一些乡里乡亲的侮辱，在挨饿受冻的同时也会被同样身不由己的副县长和老师帮助，被“揭不开锅”的人家接济，被善良的医生悉心救治。这种生活经历，让她在很早就靠近了乡建的本质，乡村建设除了物质上的脱贫致富，在思想上也需要脱胎换骨。这两种转变都需要“教育”。

周芬芳对教育的机会十分珍视，因为她失去了公平的受教育权。父亲未被平反，尽管她成绩优异，却从小学开始就总面临失学。她这代人经历“文革”，“文革”时期教育功能性失语，她只能在乡村劳动中体验生活，当然这是另一种教育。好在她生在耕读人家，初中、高中阶段，上课不得，却依然热爱读书。后来，因为身份问题，她总被心仪的学校拒之门外，又因为好心人的仗义相助，重获读书机会。如此兜兜转转，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还总被身份“抛弃”，考中厦门大学却上不得。好在她运气没有差到底，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能够了解乡村基层的教育需求。

1980年，她在宁德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双溪学区的教师。1988年，周芬芳被录取到厦门大学哲学系的“哲干班”，专业是“社会工作与管理”，她终于从一名单纯的乡村教师的思维模式中拓展开来，拥有了日后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的理论基础。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屏南县委宣传部工作，曾经书写的《健全制度，强化管理，党员教育出成效》和养路段的《一根红线系散珠》等材料，都成为宁德地区乡村建设的典型文章。同时，她向电台、报刊投稿，创办屏南县业余讲师团，深入了解屏南基层的方方面面。她的“皮鞋”逐步穿上了，但是“布鞋”的根由不敢忘记。她的成长是实践中的成长，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思考，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实践，才是她参与乡建工作的深入时期。

（二）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创兴村的“二十年”

周芬芳的基层之路从20世纪90年代在县委



图3　2017年参与新四军成立80周年活动

① 潘家恩.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导论.

宣传部开始，之后到了乡镇当党委秘书、宣传委员，又到县委报道组当组长，后来又去了屏城乡当乡长、党委书记，然后升任副县长，再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一直做到了县政协主席，2019年退休。之后，她依然助力“乡建”工作。

作为一个深刻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意识到“文化”是振兴乡村的重要方式的基层干部，她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创兴村。偏远山区在客观上反而拥有不少远离尘嚣的古村落，古村落的资源禀赋不可再生，作为文化遗产适合申报非遗项目，于是，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这个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成功。屏南在文化领域获得了很多肯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项，国家级非遗项目5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个，中国传统村落22个，中国文化之乡5个，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7个，“屏南革命旧址”包括6个村落中的革命遗址遗迹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等等。周芬芳还编撰了《乡土屏南》等20多部地方文化丛书，屏南县曾获文化部“全国文化遗产日奖”“福建省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贡献奖”。

古村落的申遗成功和各类成果的获得，充分证明屏南文化资源的价值。周芬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于是她亲身参与并且推动基于此的乡村文创项目，同时帮助屏南进入了古村复兴、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而通过文创兴村项目实施，屏南县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创产业发展示范县，成为福建省唯一被列入住建部首批全国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县。

我参与了首届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打算以“一个人的乡建史”为切入点去观察乡村，种下一颗乡建的种子。于是，我荣幸地参与到对周芬芳主席的小组采访中，从她身上去体会中国力量。屏南入夜，调研小组活动临近结束，临别前的晚会上，周芬芳唱着一出四平戏，让我们体会到她的能歌善舞。夜幕之下，她的声音已经不是青春时候作为文体委员的嘹亮，可从中你能感受到一位老人对于地方戏的真诚喜爱。理所当然，地方戏的保护、甘国宝文化的挖掘、中国木拱桥传统技艺的留存等等，都深入周芬芳这位基层干部的生命中。

二十多年如一日，夏夜的我们听她口述过去的故事，说到细节处，得知很多文创人才是外来人口，是新村民，周芬芳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从日常饮食到子女入学，看病吃药到交通出行……有问题就可以找她，她对前来振兴乡村文创事业的新村民保持24小时开机。2019年至今的疫情期间，更是关怀备至，润物细无声。有个笔者亲身经历的实例：我们外出调研，周主席随行，下雨了，大家带的伞不够，一转眼，周主席就在附近商场买了几把，我们能够人手一把。见微知著，她是发现者，也是实践者，这跟她作为基层干部的乡建自觉和实践是一致的。

学人们下乡已经有一个共识，来屏南调研，一定要找到周主席，你想要任何资料，想找任何人进行口述搜集，或者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她。她有“百宝箱”，也是“齐天大圣”，更像是“山神观音”，她足以让你“如意”。

只是，她从不高高在上，她是个邻家大姐，更像是一个普通农妇，她已经将多年穿起来的“皮鞋”重新穿在了“布鞋”里面。

（三）“皮鞋”们的“布鞋”领路人

乡建与调研做久了，研究者们最担心的就是怎样融入当地，怎样从当地得到最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怎样找对人和途径。语言不通，地域陌生，“皮鞋”学人们穿起再破的“布鞋”，也难以贴近研究对象。

周芬芳穿在外面的“布鞋”，可以引领你走进这片地域。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她懂乡村治理，能够带我们接触乡村干部，在档案和准确的知情人那里读懂一个村庄的建设史、发展史；她曾经是一名教师，跟教育口相熟，梁漱溟时代的“教育下乡”是乡建的重要内容，所以从教育史上领悟乡村文化建设和思想发展是很多学人的选择，她足以让你深入屏南教育的各个层面，读懂一个乡村的教育史、文化史；她致力于地方戏等种种非遗文化保护多年，本身就是地方戏的参与者和继承者，当你想要了解地方非遗传统，为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努力的时候，她可以亲自唱给你听；她作为哲学系的毕业生，有理论基础，在跟学人对接的时候，并没有学问上过多的隔膜，反而因为多年的基层工作，她已经将哲学概念渗透在为人处世的具体生活中，学人们遇到的困难，她都能

感同身受，将现代性带来的张力融化在乡村的话语中，让学人的研究之路平坦很多。

入夜，我们一众穿着“皮鞋”的人围着她，听她口述。每当说起往事，她的声音有时候会小下去，大概是伤心事，她不想多提及。大多数时候，周芬芳的声音是“人未到声先到”，即便是口述已经几个小时，她都精力充沛。她思路敏捷、如数家珍，她底气十足，像是黑夜里的火烛，仿佛永远不会暗淡下去。尽管过往的苦难曾经让历史暗淡过，但她宽容这一片她土生土长的土地，关于乡村建设的热情，她始终不会忘记，一如无数参与乡建的基层干部那样。

你低头看一看，她果然穿着一双真实的布鞋，鞋底有泥土，可是芬芳。

（对谈人：周芬芳，福建省屏南县政协原主席，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

七、张赛：让乡野成为学堂

2022年暑假，当我再一次看到“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的活动时便立即下定决心报名参加，来弥补上一年在举办第一届硕博研习营时因顾虑到孩子太小又不能同行而错失的机会。吸引我参加这次活动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从个人角度来说，想看一看福建屏南乡村的样子，想听一听云四坪的村歌，想走一走温教授的一亩田；二是从事业发展角度来看，向往交叉学科的互相交流与碰撞，期待能够帮助解决现实复杂的单一学科无法突破的问题；三是作为一名大学的年轻老师，学习田野调查方法与技巧，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教学知识储备与实践能力。

知止而定，静能生慧。在踏上南下的征途中，我认真翻阅了2018年与2019年《“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这两场来自疫情之前的西北（山西、河南、陕西）与西南（重庆、贵州、云南）共六省的走访实录，让我倍感亲切与感动。出生在山西工作在重庆的我，从这些文字里看到了身边的故事，有人文、有生态、有技术、有经济，有乡建与革命的探讨，有千年的函谷关与老子的雄文《道德经》……恰逢暑期追看了大秦帝国的裂变、纵横与崛起，不禁感慨，乡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需我辈不断敬仰、传承并创新的！脱离了历史，脱离了乡土的任何行动，都是乏力的、空洞的。历史的视角便是我们需要训练的思维方式之一。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很庆幸有过一段充实忙碌的乡村生活经历，有了对于20世纪90年代农村情景的真实感受。曾经一口气读书到博士毕业的我，在工作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光荣和自豪。因为当我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一位专家曾经问我：你都到博士后了，现在农业的一些实际问题你是否能够解决？我很汗颜。伴随而来的是，当我回到老家时，看到日渐凋零的村落和荒芜的土地，发现脑子里的理论知识没有任何用处。当我在课堂上面对一张张年轻学子的面孔时，我只想告诉他们不要走了我的来时路，让学问脱离了现实。象牙塔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泥巴墙里的实践更真实，我们要做更接地气的学问，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一）自由探索扎根生态新农人

2018年12月恰逢第十届中国社会化生态农业大会在成都举办，我带着9个月大的二宝出发了，因为我哥哥和嫂子住在成都，说好了帮我带孩子。那几天我便流窜在各个分论坛，了解了现实中的生态农业是如何开展的，结识了在重庆和四川做生态农业的小伙伴们，并约好有空去走访学习。在这次会议上，一些新的词语进入了我的视野，如农夫市集、丑菜美食趴、老种子交换、小农户与大市场、重建人与土地的链接、四洗三慢等，我似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健康的身体需要健康的食物，健康的食物需要健康的农业，走生态农业的道路必是未来的方向。2019年暑假我便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加了分享收获农场第16期新农人实战训练，在和众多一线的农场主们交流学习后，进一步明确了我作为高校教师的方向，那就是为乡村为农业培养源源不断的新农科人才！未来的职业农民，懂得生产和管理的新农人将非常稀缺。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战场，理应顺应时代的要求，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培养一批真正爱农会农的人才。

2019年9月新学期伊始，在《耕作学》的第一节课上，我积极地向同学们介绍了生态农业的大好前途，邀请100多位同学加入“生态耕读家园兴趣小组”，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从播种到管理、收获、销售，沉浸式体验农业全产业链，并坚持不用化肥和农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种的瓜

果蔬菜。在这样一场没有学分要求的探索中，5个班的同学最后只有9位同学响应加入。我们一起利用空余时间，去参观学习，去制作堆肥，去开荒种地，最后总结分享。“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遇到了具体的生产技术、人员组织、时间安排、宣传教育、产品包装及销售等系列问题，但是同学们的深刻总结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肯定，我明白，这样的实操训练是有必要的！尽管知识技能上的短暂缺失让我们的种植失败了，但是我们心灵得到了成长，我们彼此有了更多的价值和情感的碰撞！

（二）作孚精神赋能教育乡土化

正在探索实践教学的我，遇到了在龙车村深耕多年的周鸣鸣老师，我被她的精神感动，被她的教育思想感染，更被她弘扬的卢作孚“兼善”精神吸引。于是2019年年底我们以龙车村为战场，联合申报了西南大学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创办了“兼善生态美农场”，作为开展学生实践教学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载体。疫情的暴发和常态化的管理并没有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周老师一直说，如果没有我，她是不会做农场的，因为她擅长的是美学教育和思想教育。但是为什么支持我呢，因为她觉得值得做。在她看来，我是一个单纯又大胆的年轻人，只是缺少经验和锻炼的机会。于是，周老师自发地出资3万元，无条件支持我们启动农场建设。后来农场在兼善精神的引领下，不断地吸引了众多优秀的社会资源。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链接了川渝及全国生态农业网络，开展了本地化生态农夫市集及大学生的调研活动，与生产一线农友近距离接触，与生态农业领域专家学者积极互动，与生态圈的各个组织、平台、机构、政府等各界力量逐步形成了合力。

明诸心，知所往，力行之。卢作孚曾说过，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培育社会。这样的教育思想不正是告诉我们教书育人要从实际出发，培养的学生未来要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吗？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如果说卢作孚的精神比较遥远的话，那么近在眼前的周老师，用她的身体力行和大公无私，真正点燃了我！当我看到她老人家多年如一日地带领学生开展志愿服务，从基层的需求出发，不断燃烧自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时候，我落泪了。我看到了教育的多样化，理解了教育的真谛，似乎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教育无处不在，生活即教育，生产即教育！当年的卢作孚因培养人才创办了一系列如期场学校、船夫学校、力夫学校、挨户学校等。他培养出来的人，宁愿拿着低工资，也不愿意离开，因为他们觉得收获到了比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兼善”的家国情怀，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是超越了物质功利的美学精神！他们的知识技能与情感认同高度一致，走了心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三）兼善情怀助力乡野成学堂

“建设一批耕读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打造一批劳动教育品牌项目，每学期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到农村、到林区、到实践基地、到生产一线现场调研考察、实地学习，增强学生服务‘三农’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021年9月16日，教育部官网在发布《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如此强调。伴随着国家颁布的有关耕读教育、劳动教育的文件出台，为我们探索的实践教学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为了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我们牵头成立重庆社会生态农业联盟，并联合多家生态农场、机构和平台，多渠道拓展实践教学场所，建设专兼结合的耕读教育教师队伍，以西南大学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为载体，聘用退休老教授、农林科技专家、种养能手、本土人才、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优秀资源，集体打造兼善劳动教育品牌项目，从文化引领上助力耕读教育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已经连续开展5届西南大学生态农耕与绿色发展学生实践活动，得到了近500位同学的高度认可。

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乡村建设需求及农业生产实际，融本土兼善文化和卢作孚精神，集思政、劳动和美育为一体，校地共建“新农科”育人平台——兼善生态美农场，构建专兼职耕读导师队伍，逐步打造“兼善大地课堂”生态新农人培养模式。通过再现乡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开展整全育人，以食物体系为脉络，不断培养和激发学生的乡土情结，大农业、大健康观及创新创业能力。建设两年来，成功孵化8个大学生创新创



图1　在CSA联盟支持下联合璧山农委一起举办的生态新农人培训，特别邀请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第一排中）和哈佛公共卫生学吕陈生教授（第一排左起第五）开展了一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生态农业巅峰对话”

业项目。在刚刚过去的第五届生态农耕与绿色发展实践活动中，2020级的农学专业同学们经历了一场走近乡土的实践活动后，对农业有了新的认识，转化并提升了同学们在农业领域的择业意愿。这才是学农的同学该有的模样啊！

（四）空杯之心营造学习新氛围

人贵在于，自以为非。从书本走向田野的历程中，若能抛开理论的偏见，放下固有的认知，以空杯之心真诚交流，不戴有色眼镜，做到“以心体之，以身践之，勿以空言视之”，将会收获更多。在参加这次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的学习中，我有幸当了回“粮食安全与生态转型”小组的组长，真诚地接纳每一位小伙伴，不以固有认知限制自己，我们一起走访调研，一起交流分享。最终我们小组以“基于大食物观的粮食安全屏南行动”调研报告喜获一等奖。所以凡事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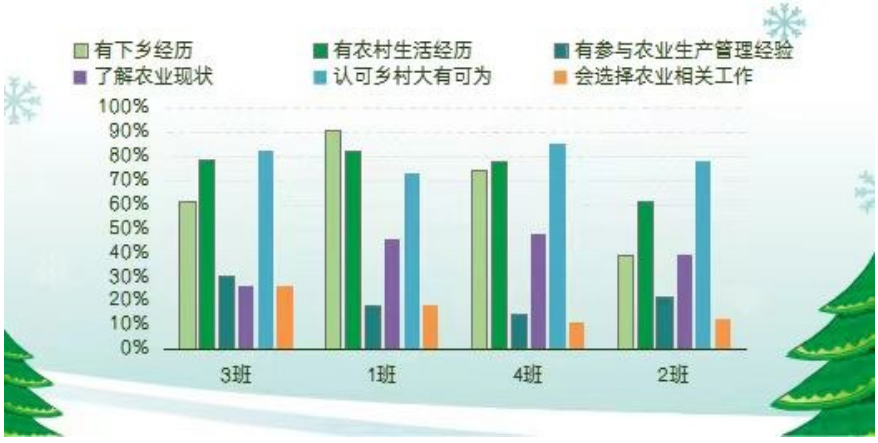


图2　西南大学2020级农学专业同学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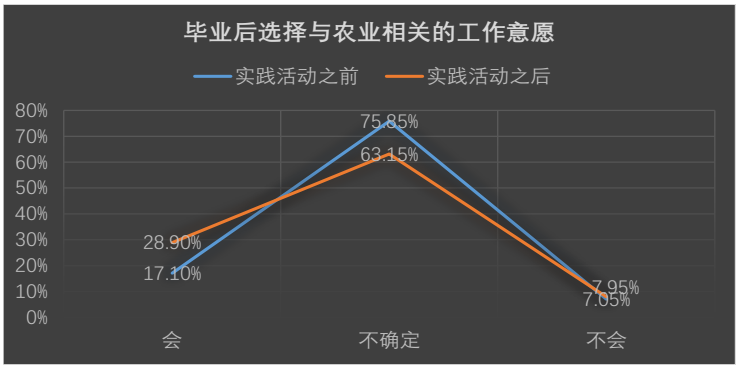


图 3　一场实践活动之后对同学们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意愿的影响

认真对待，总会有收获，用脚步做学问，向前辈学智慧，这样的研学大概是学者们始终要保持的状态！在乡土中，我们看到屏南文创振兴乡村经验的精髓，便在于艺术家的空杯之心，不以艺术的固有认知来改造社会，而是从一句温情的口号“人人都是艺术家”开始，激活了村民们的创造力和乡村活力；同时也在于基层干部的空杯之心，敢于创新和担当，摆脱思维的贫困，接纳艺术家、教授、农民的不同意见，正如潘家恩老师所说：“在屏南，你会发现官员不像官员，艺术家不像艺术家，教授不像教授，农民不像农民。”没有了身份的限制，没有了思维的固化，短短 10 天的营地学习和交流，留给我们的是满满的回忆和感动，有对乡土社会的再认识，有对城乡中国的认同感，有对专家点评的再思考，有对小组成员的感激与感动……

乡野学堂的学习氛围、交叉学科的互相碰撞，我们犹如星星之火，回到熟悉的地方，带着这份回忆和感动将再次启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善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做事之前要先学会做人，古代圣贤如此，我们更应谦虚、谨慎、认真，不负韶华不负心，不负青春不负梦，在乡野这部无字书里，学做真人，最终活成自己心中的样子。

八、李苗苗：希望的可行性

2018 年周立老师一行发起的首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活动，行走至山西蒲韩时，我正在组织“乡村振兴，青年先行”的全国大学生爱故乡高校论坛暨第 26 届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2019 年第二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活动，则是我从云南丽江与农民种子网络团队交流前脚刚离开，潘家恩老师一行后脚便到了丽江；疫情之后的 2022 年第三期“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活动，未曾想到，我竟因缘巧合地成为营员，在福建四坪村参与整个活动。

2012 年爱故乡文化寻根从福建出发，2022 年爱故乡乡创赋能再次从福建启航。从“发现故乡之美”到“重建美丽城乡”，十年间爱故乡团队在城与乡之间的奔走往来，不断地在自我反思中调整实践方向，在紧跟时代动向中自我改造。下一个十年，或将以她润物无声的情感力量继续疗愈人类，给予希望的力量。

（一）回望十年文化寻根路

十年间，爱故乡行动似乎一直都在官方话语与民间行动的紧密互动中润物无声地做着有力的行动。

在爱故乡年度人物的走访过程中，我也深切品味那些蕴藏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人生百态，乡村百业”之中的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和文化力量。逐渐认识到，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大部分人斩断原有的社会关联，去往陌生的异乡寻求出路，带来的是精神、家庭，乃至于文化的割裂，如此的社会大潮流持续十多年，出现的是层出不穷的现代性问题。由此，爱故乡的文化实践，或许正是缝合这种断裂，寻找新可能的尝试性探索。在走访爱故乡年度人物过程中，给人带来无尽兴奋和惊叹，更给人以无尽的力量和希望。虽然每个爱乡人士所创造的事业都遭遇不被主流价值所认同、难以生存、无法可持续等尴尬困境，甚至还有来自家庭的阻力，但每个爱乡人士都在从不同层面努力坚持。在中国五千年以自然村落为主体的小农社会体系里，皇权不下县，乡贤维持村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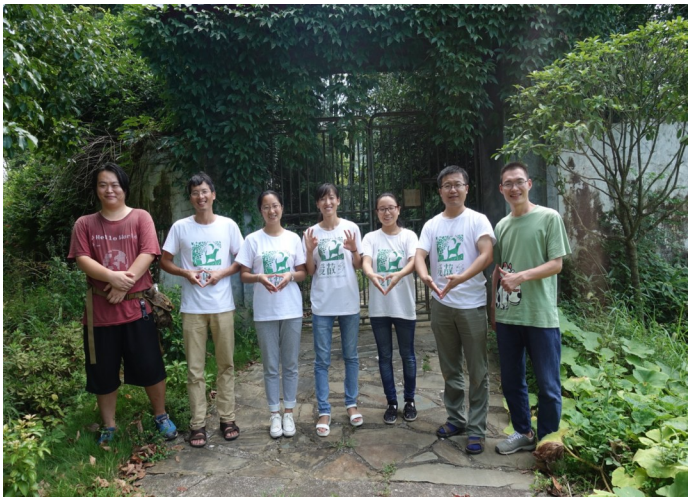


图1　爱故乡团队·湖南汨罗（2017.8）

加之宗族约束，形成自治；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形成了村社自治共同体。而现在，乡土自治体系瓦解，基层组织涣散，正是全国各地的爱乡人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犹如乡贤，承担了社区共同体的公共服务工作，并不计回报，默默奉献。这些新时代的“新乡贤”回到家乡所做的事情，让人们看到了来自民间大众的力量和希望。

我于2017年1月加入爱故乡团队，主要负责青年爱故乡项目，同时与团队协作开展其他全国性主题活动。在工作实践中参与爱故乡的文化实践，亲临工作现场，充分认识到那丰富而富有张力、大音希声却生生不息的文化实践的力量。至今，爱故乡已由一个民间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随着时代的变化，爱故乡团队也一直在变化。自2019年10月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七届爱故乡大会暨湖湘乡村振兴论坛起，爱故乡的实践实现了在地化运营，由在地政府主办，在地政府联合在地社会组织承办，我认为，这是爱故乡的众望所归，是民间发育与政府赋能的实现。自2018年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爱故乡不断地进行调整，从文化寻根向乡村文创进行转型探索，通过村歌计划、爱故乡驿站、爱故乡书吧、艺术家驻村等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蛰伏探索五年后，2022



图2　第一届爱故乡大会·福建福州（2014.12）

年以社会企业的形象，以更加专业的“文创赋能”模式参与各地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文创＋”乡建项目，成熟地输出村歌计划、艺术下乡、众创空间营造等项目。

这种“在地行动，深耕故乡；文创赋能，盘活乡村”的爱故乡文化实践，让我也深刻认识到，爱故乡文化实践所包含的本土意义与全球价值，在形态各异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中，孕育着独特的生存智慧和一整套生活方式，也正是这盘根错节、润物无声、大众参与、连接本土根系的文化实践多样性，维系着千年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生生不息。也正是这些“大众”实践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坚韧底座。

（二）文创赋能再出发

2020年8月至今，爱故乡推动成立福建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联合四坪村乡贤、村民推动成立了屏南爱故乡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指导运营大树学堂、星空营地、小毛驴四坪农园、爱故乡驿站等项目，同时打造爱故乡书吧共创空间、“云四坪”、“我在四坪有亩田”等文创品牌，发起“云四坪·云村民暨百村数字村民”计划，同步在女娲NVWA数字藏品平台上线“云四坪·云村民”系列数字藏品。

这次“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调研活动，我穿梭在小而精致的四坪村，又一次感受到了爱故乡的力量。作为一种源起于情感的大众动员力量，竟可以在元宇宙时代如此领先地走在前面，通过文化认同和乡情乡愁，给主动下乡留一条路、开一扇门，于是形成了新村民、老村民与云村民的线上线下、云端地上的超越空间界限的互动。人们物质上的需求越来越容易得到满足，对乡村的向往也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疫情加持之下，人们对于从虚拟空间获取各式各样体验的需求更进一步强烈。未来，城乡之间的融合共建或许很大程度上需要这种沉浸式体验来完成，把基点锚定在现实的资金资源之上，通过“云”连接，为乡村引资、引智、引市场，以数字藏品为媒介，推动人才、资金、市场资源等要素在乡村与城市的双向流动，进而实现“共建美丽城乡”的夙愿。而我在四坪期间，正是跟随爱故乡的黄志友、黄靖轩两位爱故乡团队的老师去踩点，他们正是在为爱故乡书吧办理运营手续，为“云村民”与四坪村的链接更紧密去调研村庄，把“云上”的数字村民与“地上”的乡村空间、乡村产业，乃至于瀑布、云海、日出链接在一起，紧紧地锚定在现实上。

爱故乡书吧位于映月湖畔，于2022年5月18日开始试营业，集阅读、交流、咖啡、茗茶、手工、活动等多种功能为一体，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文化艺术空间，是一个阅读、品茗、喝咖啡、文创体验、产品销售、放松休闲的场所。但空间营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书吧还承载着村里的社区文化空间、研学空间、文创产品展销平台等功能，是村里的文创孵化器，更是给进入乡村的人一个公共空间，城里有星巴克，村里有爱故乡书吧，其所承载的正是一个链接爱故乡人士，



图3 合照

聚合各方力量支持乡村建设的能源站功能，链接起古朴与时尚，低调与奢华，乡村与城市。

返乡青年潘国老与大海是四坪村的老村民。他们在村子里做四坪窖藏红曲黄酒，传承非遗的酿酒工艺；做稻鸭共作的生态农业；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孕育的多样物种进行发酵床养鸡、稻花养蜂，进而探索“秘蜜鸡地”研学活动，研发蜂蜜酒；通过梳理粮食史，打造四坪农耕博物馆，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和农耕研学。这些返乡青年从结束打工生涯，决定返乡的那一瞬间，就开始在生养自己的大地上书写新时代的城乡篇章。

民宿主茄子一家、91号的西餐师小齐、画家沈明辉等是四坪村的新村民。这些年轻人想要探索一种城乡流动的生活方式。他们看到了乡村的价值，安静、平和、空气、云海、日出，这样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他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与家人在一起的陪伴，没有内卷，没有躺平，没有996，也没有精神内耗，他们不仅仅是艺术家，也是劳动者。从城市回流到乡村，这是青年爱故乡行动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当我们无法在城市找到归宿，又不愿意在现代制式劳动结构中消耗自我时，是不是可以去往乡村进行一种立体的生活方式的探索呢？四坪村也给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路。或许这些新村民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可毕竟是另一种可能。

（三）希望在路上走着

自大学以来，参与乡村建设已整整十年，而这十年刚好也是爱故乡计划从发起到深耕，再到转型的十年。从大学参与支农下乡接触到乡村建设的实践，到毕业后在爱故乡团队的工作，至2018年去读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到研究生毕业在NGO组织、乡村文旅公司工作一年半后，我再次参与了福建乡建团队的乡村振兴实践探索，而今，我又进入高校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大抵是一个“归队－离开－复归－又离开”的过程。我在边缘处参与着名曰乡村建设的实践，而这种边缘有时却又成为某种主流。毕竟，20世纪的乡村建设也并非一种有着自身清晰边界的思潮与实践。独立自主却又有着团队做依托，我在不断尝试中游走于象牙塔与泥巴墙，游走于乡建实践平台与大众参与的各种探索之间，冷眼旁观这十年自我成长的流金岁月，亦热血沸腾地触摸十年爱故乡行动的实践探索。

十年间，从当初的“支农下乡”到当今的“乡村振兴”，21世纪初发起的乡村建设实践由最开始的非主流，变成了当下的主流。我真担心，这群默默在耕耘的建设者们又一次失语，之前因为“非主流”而不屑，像看大猩猩一样地看着这群人拉着毛驴种地，被嘲讽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现在因为“太主流”而不屑，现在因为“太主流”而不屑，比起宏大的史诗叙事，老百姓更愿意相信微小而真切的故事，更愿意相信肉眼可见、伸手可触的世俗生活意义。在民间，对富裕的向往是一种非常崇高且真实的人性。可越是如此，就越是考验团队的自我反思力和敏锐力，越是考验20多年乡建实践的初心和底色，越是考验责任感、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大的政策环境看着是变好了，实则大浪淘沙，乱象丛生，各种力量深入乡村，顶着乡村振兴的名义涌向乡村，都想收割利益，这对于原有的五大乡建体系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如何在自上而下的官方话语下，在扶贫办改乡村振兴办的机构名称调整的时代大势空隙里，始终坚守人民本色，始终为建设社会而建设乡村？如何警惕乡村振兴之风的泥沙俱下中，仍旧坚持自以为非，不断改造自我的学习？如何在进行自我历史谱系的书写建构中保持对其他实践与脉络的开放，从而避免通向一种本质化的自我认定？如何不断地做自我改造，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借势做事，在原有的实践经验中做增量的提升？如何在形势愈发严峻复杂、不确定性激增的未来，依旧保持大局观念、整体思维与长远视野？这是要在当下极度复杂的环境张力中把握的严肃命题。于深耕二十年的乡村建设团队来说，更是自我革命的重要命题。越是问题复杂，形势严峻，乱象丛生，人生艰难，不确定性激增，越是要增强大局观念，整体思维与长远视野；越是要从自身做起增加力量，越是要懂得付出与牺牲，越是要树立与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越是要学会担当，学会团结。

对希望的寻找让我奔赴四海，全国流浪。在山穷水尽处，却总能因缘巧合地相遇同样在不断探索的师友们，得以“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今，有幸成为一名高校教师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这些“在乡村发现中国”的经历和师友们对我的指

点都一并成为滋养我的源泉，常常会想：要有怎样的人生才配得校园里青年人眼中闪过的一抹光亮啊？

四坪实践，是爱故乡行动新十年的一个新开端。重庆武隆、陕西留坝火烧店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下一个十年，将又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十年。2022年爱故乡转型为社会企业，重新起航。历史向来是被人为设定的时间节点，十年筚路蓝缕，都是序曲，未来的希望还在路上走着。正如威廉斯在《希望的源泉》一书中所说的：“不要让绝望有说服力，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爱故乡这一具有反思的实践行动，正给予希望以可行性。

九、王金妹：纠结中的前行

两个月前的一个深夜，潘家恩老师在工作群里问是否有小伙伴愿意围绕“在乡村发现中国”写一篇真情实感的文章，我第一时间自告奋勇站了出来。当初得知受疫情影响已中断三年的“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活动（2022）要与我们的第二期“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同期举行，激动了好久。8月份，活动如期举行，三十多位在读硕博士生、年轻教师和跨学科调研活动的专家老师调研、畅谈的画面历历在目，画面中依稀也看到了2017年的自己。彼时，自己研究生在读，初次接触乡建，期望找到合适的方式回归乡土。一眨眼五年多过去了，在实践的磨砺中自己已成为原来不敢想的“秘书长”的角色，看过不少来来去去的人与故事。期望通过本文分享自己身为乡建人的心路历程和有限的经验，给关注、支持及想参与进来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参考。

（一）懵懂入场：何为乡建？

2017年夏天，研二下，一边准备毕业小论文，一边纠结要考博还是工作，但似乎哪一个选择都没有让人很开心。有天在刷朋友圈，被一条“夏雨雨人夏令营”的招募信息抓住了心，“如果你也有一颗愿意回归乡土的心”，“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譬如一粒种子，它能在不见不闻的地方而发芽开花”，“我不知道，理想是否会提前到来。我只知道，那生生不已的，是儿时在田野间的嬉戏打闹”。一句句，仿佛都在把内心隐匿已久的叛逆勾出来，告诉我还有别的选择。

在咨询分享那条信息的好友后，鼓足勇气提交了申请材料。于是，在那个夏天，知道了在下乡支教、募捐、去孤儿院养老院这类的志愿服务之外，还有乡建。在乡村，除了慈善与公益，还有那么多人在做社区营造、乡土教育、产业孵化、文化保育、青年培养类的事情。丰富的课程、案例和面对面分享的实践者，以及几十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点燃了我全部热情。

可随后下乡点的实践历程却给我当头浇下一盆冷水，无人指导，干部对我们这队毛头小伙不以为意而不找我们干活，看似很多事可做却无从下手……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间的差距，激起了要去乡建团队工作的想法。“我不要什么都听别人讲述，要自己去经历。”“我不信在一线工作都那样，不然乡建不会维系这么多年团队还遍布全国。”2018年夏天，正式入职没有编制、需要驻村、甚至不知道会存续几年的乡建机构的那一刻，大家眼中乖乖女的“人设”就塌了。

工作至今，看着同行的伙伴来来去去，自己也换了团队和岗位，也逐渐深度了解了乡建研究、实践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的故事。回顾自己与其他乡建同仁的经历，大家在进入乡建领域之初多是懵懵懂懂的，有不少人是带着对乡村纯粹的情怀而来，但也有人是想逃避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与逼仄的生活环境、快节奏的工作，要么是厌倦枯燥的工作内容和一成不变的生活，抑或是不满现状而寻求另一种可能……懵懂入场，了解因领域和工作方式不同产生的乡建类别，结识海外及全国各地的同行者，深刻体会不论理念、领域、工作方式或是团队，参与乡村建设即是乡建。

（二）即时在场：研究与实践，哪个更重要？

如今，乡村的硬件与软件都得到极大提升，随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在乡村兼顾“诗意生活”与“大有可为”日益成为现实。画家、设计师、导演、律师、记者、新农人，越来越多人来到乡村生活、创业。除了一线全职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以特聘专家、兼职、实习或是课题研究的方式进入乡建团队，深入了解真实的实践历程，将学问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些年，经常会被问起：你觉得，研

究重要还是实践重要？在政府干部和村民眼里，看不明说不清我们具体是干什么的，既然单位名称是某某研究院，那就是做研究的吧。在研究者眼里，我们的研究属性貌似又不明显，又扎根在乡村推动各项工作，那妥妥的是实践者啊。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既是实践者，也是研究者。但不论研究还是实践，来的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在乡村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做出恰当的选择，才重要。

1. 不能采取立场，又必须采取立场

驻扎乡村，每天与基层干部、村民以及在村的各类群体打交道，工作与生活交织在一起，会很自然喜欢某些人，不喜欢某些人。因此，很多事情，不能采取立场，又必须采取立场。比如，每天笑脸相迎、聊天爱说“这个很好、这件事包在我身上、这个小问题不用担心”的一个人，乍一看所有人都会很喜欢，会不自觉地产生信任。可如果说，这个人同时也会做事爱骂人、喜欢承诺但执行力差、事情没做好却把责任推给别人，要去和他/她对接工作的人是不是又会心里一紧有所防备。又如，每天与村民一起生活，面对某个要在村里落地的项目，会不自觉地代入村民的角度去思考其中的利与弊，尽力争取村民利益最大化，而在需要落地某个理念时，又会不由自主地通过各种方式对村民进行说服教育，容易忽略他们真实的想法和需求。再者说，大家也很容易被外貌、脾气、说话的方式等因素诱导，可能会因为某一方很帅、讲话很温柔而不自觉地关注他、认同他，会因为某一方讲话啰嗦、长得很凶就无意中忽略很多信息，或是自然而然地更容易去亲近老人、小孩……因此，在乡村，不能采取立场，以免不自觉站队，影响客观中立地去行动，但又要对每一个立场感同身受，代入每个立场去思考背后的人员结构、价值取向、利益倾向、局限及苦衷等等，才能够做出跳脱立场的判断，进而不带偏见地推动各项工作。

2. 为什么再好的理念在实践层面总是难以实现？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乡建，期望尽己所能让乡村发展得更好，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文件，匹配了各种专项资金。可纵观全国，大家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推广的案例很少。比如，我和众多认可温老师（温铁军教授）理念的伙伴一样，都期望“三级市场”与“三变改革”能在广大乡村落地，使村集体与广大村民受益。我们的团队，在各自扎根的地区，非常努力地与县、乡、村干部对接，从顶层设计、试点选择、引入专业团队及各方资源、编写项目方案，到对村民进行科普教育、拟定工作流程和多方合作协议等，各个环节尽心尽力，当地政府也大力支持，可至今未出现非常理想的案例村。为什么再好的理念在实践层面总是难以实现？

问题不在于理念，而在于如何行动、如何落地。对于政府而言，精神上支持容易，跨越部门职责、弱化绩效考评乃至突破部门利益联合起来难，要突破现有体制机制做创新更难。对于基层干部以及乡建一线工作者的每一个个体而言，想要克服各种困难做成一件事，必须具备智慧、技艺和勇气，不仅需要动用各种知识和能力，还需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与领导、长辈打交道是一



图1　福建宁德屏南县四坪古村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

回事，与同事、同辈打交道以及与下属、后辈打交道又是另一回事。此外，还要处理做事与宣传的关系，做是一回事，怎么把做的事说好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正确应对挫折与成功的心态，面对赞扬与肯定保持平常心相对容易，面对批评、质疑甚至是再努力都难以实现目标的情况，如何继续积极进取、坚持行动很难。

（三）艰难选择：坚持还是退场？

工作这几年，一边丰富见识与经验，一边锻炼能力。充实快乐的同时免不了开始担忧：继续在乡建氛围更好的福建打拼，还是回老家找份工作便于照顾年龄越来越大的父母？家庭条件不好，自己年龄也越来越大，继续在乡建领域工作几乎意味着掐断了进体制内的机会，意味着可能无法获取稳定的收入，是否可以承担这种代价？不论做出哪一个选择，背后都少不了新一轮的磨炼。回看众多乡建青年的经历，早些年，几乎都是奔着实践而来，休学参加、边上学边参加、一毕业就参加乡建的人比比皆是，一个人驻一个村，条件艰苦但乐得自在。近几年，条件好了，组建团队比较容易，也有高校老师和资深实践者指导。参与进来的人想法各异，有奔着实践目标来的，有纯好奇的，也有想沉浸进来做研究的。时代背景、工作与生活的条件、个人需求都在发生变化，但因理论与实践间的差距、团队协作与个人成长间的张力、模糊的角色与社会地位、非主流的价值选择等带来的各种现实困境一直在。

面对这些困境，有人选择去找一个工资更高、晋升渠道更为明显的工作，有人选择去体制内让家人更放心，有人因不满团队协作不足、信息资源共享不畅而离开，也有人因看不到理想的理念落地导致迷茫、孤独而离开。同时，有人历经磨砺但激情不减，有人激情耗尽但靠着不灭的理想咬牙坚持，也有人找到合适的方式扎根乡村安居乐业。

（四）结语

自“新乡村建设”兴起至今，二十多年来，已经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和几百所大学的支农社团参与进来，最早的那批参与者中的部分人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扎根乡村的团队的骨干。纵使随着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乡建受到极大的认可，乡建一线工作者的生活、就业条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通过自媒体平台关注、了解并参与乡建事业的人群越来越广、人数越来越多，但乡建一线工作者依旧是非主流般的存在，他们在乡村释放热情、应对纷繁复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经历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在沉默抑或是呐喊中做出一个个选择。茫然、纠结、挣扎，总会过去，沉默或呐喊，留下或离开，参与即是力量。在这个处于巨大变化的不确定时代，希望今后想参与进来的每个人都能够认清形势、找准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将会应对什么、有哪些可获取的支援、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有能力在乡建事业上有所作为，进而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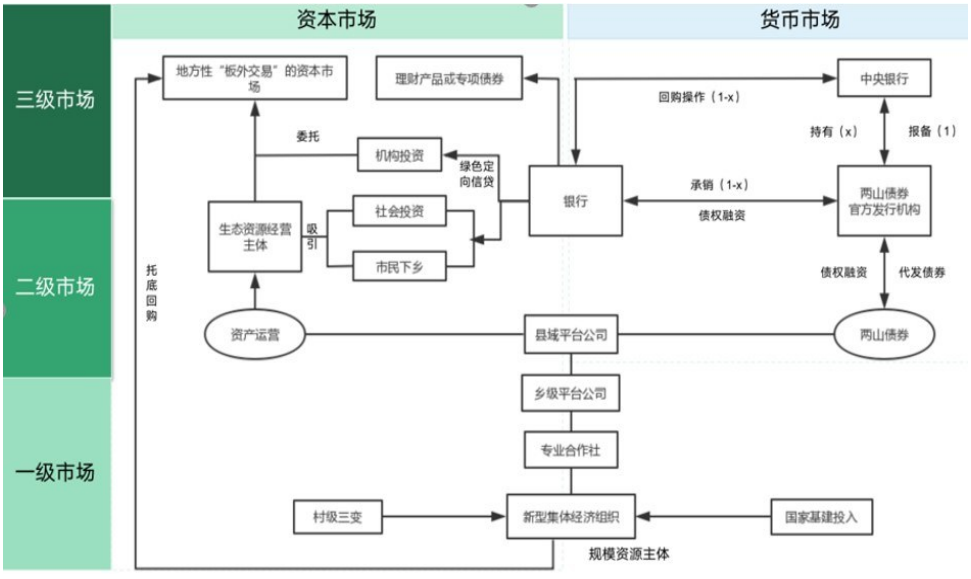


图 2　三级市场架构图

精彩、幸福。

（2022年11月于福建宁德屏南县四坪古村）

十、樊子墉：以融合的视角看屏南

我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是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参加由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主办的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了一次长达十天的跨学科的深入交流，行程满满、干货多多，学习、调研、研讨三位一体，让我们乘兴而来，满载而归。与大多数的暑期班不同的是，硕博营有一个为期四天的调研活动，可以与有着相同或相近研究兴趣的伙伴一起，对屏南这片土地下埋藏的宝藏进行自由的挖掘，这无疑为这次的硕博营增添了许多别样的风采，也在亲身的实践当中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阶段，其底色仍旧是乡土的，只有深入到乡土当中，才能获取最丰富的“给养”，将所学的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而非“悬浮”在空中，也才能将研究真正做在祖国的大地上。

与其他学员不同的是，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是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一名实习生，借助这个广阔的平台进行我博士学位论文的调研。在此之前，我大概从未想到过，我一个生于长于河南豫东大平原且极少踏足长江以南地区的纯正北方人，有朝一日会在处于福建闽东绵延不断的深山密林中的传统村落中学习、生活了半年之久。但正是在研究院这样的一个平台中，在研究院伙伴们前期打下的深厚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让我如此顺利地进入到田野当中，也让我在这半年的时光里收获到了许多我未曾接触过的、未曾预料到的、需要进行长期消化和反复回味的经历和知识，也让我对自身的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更深入的思考，更让我深刻体会到“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这句话所蕴藏的内涵。

这次硕博营有一个十分宏伟的主题——“在乡村发现中国”，起初我还没有太多的感触，但经过硕博营这十天的学习、调研与总结，使得我对这七个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乡村发现中国，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就是将乡村作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一种媒介，因为乡村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发源，也是中国当下的映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载着中国发展的未来。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乡村之于中国，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是中国未来面对全球风险与挑战的“压舱石”。回到本次硕博营的举办地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在我看来，更是将乡村的媒介属性展现得十分具体，主要体现在融合性上。

屏南乡村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早期城乡关系中“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式”的结合，而是依托于技术与理念的跨越式发展，城乡各种要素之间彼此流动、互通的频次不断提升，并在此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了乡村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城乡话语结构在不断被重塑，二者之间的边界也开始逐渐模糊，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之态。

屏南乡村的融合首先体现在居民的构成。这一点在我第一步踏入四坪村时就已经深有体会。当我从在山路上盘绕了一个半小时的班车上晃晃悠悠地下来，拎着沉重的行李走过村中古老的青石路时，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子里有许多年轻的面孔，这似乎与中国大部分乡村青壮年流失现状有些不符。在一切收拾停当后，研究院的小伙伴便引领着我开始了走村，挨家挨户地串门。在小伙伴的介绍中，我才得知，这些年轻的面孔大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各种职业的城市居民，在村子里租下了一栋宅子，过起了乡居的田园生活。因此，他们也被称作为“新村民”。而当我到了隔壁的龙潭村，才发现这里更是居住着一百多位的“新村民”，日常生活与村子里的老村民已经开始交融在一起，有着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社区生态圈的趋势。更有意思的是，在四坪和龙潭生活的“外来人”新村民，却像老村民一样拥有了农村集体组织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每个村都有一位新村民当选了村民委员会的副主任一职，代表新村民正式加入到了村庄的治理当中。并且，大多数新村民都被政府颁发了新村民证——类似于居住证，可以享受与当地人同等医疗和教育的待遇。可以说，新村民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正式加入到了村集体当中。这种在发达城市才较为常见的，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共存

的社会结构，在屏南的诸多村庄中都存在着，并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扩张。对于一个村庄而言，以某种特质或者某种资源吸引大量的外来城市人口居住并不是难事，但如屏南这般几乎将整个县域都涵盖进去，形成普遍化的新老村民融合生存的情境，仍是较为罕有的现象。

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自然为屏南的村庄带来了诸多新鲜的改变，促进了新老村民生活方式的融合。这种融合并非是以城市现代性扩张为主的单方面的倾轧，而是双向的有机的融合，或者说，乡村的生活方式反而在融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城市居民的进入，一定是打破了乡村旧有的以农事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丰富了闲暇时间的活动内容。如带领老村民开办乡村集市、举办音乐会、教授绘画、制作咖啡、经营民宿等等，这些往往是都市精英阶层消磨周末时光的行为，却在屏南的村庄中成为了常态。此外，前汾溪村的老村民们，在中国美院师生团队的引领下，积极参与到了社会美育的各种活动当中，厦地与双溪的部分村民也在公益组织森克义社的影响下，焕发了对于古村落的保护意识，积极投身于村庄的维护、建设等实践当中。但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进入乡村的前提，是对归园田居式的乡村方式的认可和向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老村民的生活方式对新村民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和强烈的，这种影响虽然可能无法以某种形式明晰地展现出来，但却如草蛇灰线般深深嵌入到了日常当中，换句话说，乡村生活中的那份质朴，才是对于城市人而言最为弥足珍贵的。

正是由于人的融合，才使得屏南有了更加广阔和肥沃的土壤，为其他方面的多元融合提供了生长的环境和给养，这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体现在思想和观念的融合之上。在一次访谈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项目总策划林正碌时，谈到城市人和农村人做事的区别，他认为农村人更能够专注在做好一件事情上，并引用了自己教授咖啡制作的例子，农村人往往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学会，因为在学习的时候不会有其它杂乱的想法。在访谈中国美院副教授陈子劲时，他也谈到他们在前汾溪村所进行的社会美育实践，看上去是在向老村民进行观念的传递，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们反而更多地被老村民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种在交流、碰撞中的融合无疑是美好的，而这份美好也结出了甜美的果实，即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愿意到屏南成为新村民的一员，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老村民愿意回到屏南参与到家乡的建设当中，就比如前汾溪村的村民郑夏玲，在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村子里，与中国美院的师生一起，投身到社会美育的行动当中。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屏南县的多元融合？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来，其实就是媒介的力量。屏南县在对外的宣传中，“党委政府＋艺术家（能人）＋古村＋村民＋互联网”是屏南得以成功的模式，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周芬芳曾说过：“虽然互联网放在最后，但它的作用是最大的，因为有了互联网，才有了现在的一切。”纵观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发展史，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乡村变革当中，媒介一直都在承担着关键的角色。尤其是大众媒介的出现，将世界带到了乡村的面前，给原本“封闭”的村庄开辟出了一条联通外界的窗口，让乡村与城市、与其它地域产生了跨时空的勾连，使媒介主动影响乡村发展成为了可能，也切实推动了乡村向现代化的发展。而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继续加速了信息由城市向乡村的流通，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也实现了乡村信息向城市的反向流通，信息的易得性使得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信息接触的差异被无限地缩小，城乡之间的“鸿沟”被更进一步地弥合。可以说，互联网对于乡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也是跨越性的。虽然在实际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因为经济收入、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所呈现出的媒介素养，尤其是数字化的素养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接入，中国的乡村也成了全球网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第二届硕博研习营调研的期间，就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位居住在龙潭村的年纪相对较大的老村民，喜欢使用手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国际新闻，并会将看到的信息和自身的评价积极分享给朋友和特定的圈子中，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

分析甚至要超过多数的在校大学生。一个偏远山区中的普通村民，能够实时接收到来自于全球的信息，同时也能够将信息发往全球，从而深深地进入到了全球化的社会体系当中，所依赖的就是媒介的力量。

随着传播学的不断发展，媒介的内涵与外延也在被不断地拓展和深化。普遍的，媒介是指被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和载体，之后又指代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在彼得斯看来，媒介也一直就有“元素”“环境”或“位于中间位置的载体”之意，在其著作《奇云：媒介即存有》的开篇就提到，“媒介是容器和环境，它容纳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又锚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并使人类能‘为其所能为’”。媒介就是“中间”，“中间”就代表着关系，而关系所隐含的就是连接，将不同事物连接起来，就是媒介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又何尝不是一种媒介。相较于城市而言，乡村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具有可塑性，有着无限的可能，因此也有着更多可以试错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时下最热的元宇宙，也正在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进入到乡村当中。在四坪村，以NFT的形式，推出了中国首批云村民，他们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云团，与在地的老村民进行互动和交流。可以说，四坪村此时就处于云村民和在地村民的“中间”，是维持二者之间关系、连接二者的媒介。或许，这就是“在乡村发现中国”的应有之义。

此外，乡村的媒介属性又可以从它的整体性体现出来。不像城市和发达地区各行各业有着明确的分工，社会的垂直化越来越明显，乡村则更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外部看，每一个村庄都是独立的个体，从内部看，村庄里的每一个要素、成员之间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简单地区分开来。因此，每一个进入到乡村当中的人，都需要具有整体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一点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尤为明显。当我以一个传播学的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到屏南的乡村当中时，才发现我来之前的预想大多都被现实所击败，我无法只是使用传播学的知识去解释我看到的现象，而传播学似乎也不是乡村研究当中最迫切需要的学科，因为不能帮他们解决更多实际的问题。因此，我在研究院小伙伴们的帮助下，了解乡建先贤们的辉煌事迹，也学习了什么是“三变改革”以及温铁军教授的三级市场理论，同时也接触了生态农业相关的知识，还在一众艺术家的熏陶下感受到了艺术乡建的魅力，更多的是在诸多老师前辈的带领下，体会到了从怎么说到如何做的转变。在硕博研习营期间，也与来自全国多个高校的多种专业的伙伴有了深入的交流，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在乡村的调查研究当中，只有保持着跨学科的视野，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才能够调查全面，得出符合实际的有用的研究。就像第一次在四坪村见到潘家恩院长时他告诉我的，不要带着你的预想进入村庄，而是要让村庄带着你发现问题，“先有行，才有果”，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够做到“求仁得仁”。可以说，乡村正是将多种学科融合起来继续调查、实验、研究的最佳田野和媒介。

最后，借用乡建中流传的一句话，“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乡村正是将我们聚在一起，并且让我们在散开时也不会断开彼此之间连接的媒介。

十一、罗建章：驻地发展 接力陪伴

不了解乡村，何以了解中国？在乡村发现中国，还要在乡村中发现乡建的足迹。

2022年盛夏，我重返屏南，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自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成立以来，以屏南作为学术田野的研习营给青年学子带来了至少三点收获：首先是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给营员们提供了一个“在乡村发现中国”的跨学科交流平台，其次是在心房播下了一粒百年乡建的种子，最后是一段美好的乡建记忆和难忘的乡建情缘。当下，乡建在全国各地的驻点渐成燎原之势，新乡村建设工作的经验归纳日益迫切，因而在今年启程前往屏南之前，我接连去了几个驻点，萌发了对乡建青年和乡建发展模式的研究兴趣，通过回顾21世纪以来乡建驻地发展模式的演变历程，形成了三对关系的思考。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学子也正通过接力陪伴的方式探索乡建学术化的人大实践。

（一）驻地发展：新乡村建设的发展模式

潘家恩老师曾在《读书》杂志撰文“百年乡

建、一波三折”，或许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指出的，“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不过，伴随着进入21世纪以来的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乡建正以老树新芽的勃发姿态，勾勒出一幅崭新图景。其中，乡建团队在中华大地上开展的试验与建设是新图景的缩影，驻地发展是乡村建设的重要模式。我们本着“近详远略”的方式，详细回顾了乡建团队21世纪以来在全国的驻点，梳理出具有标识意义的时间轴，并描摹出驻点空间分布情况。

百年乡建，一脉相承，驻地发展模式源自于百年乡建的传统积淀。郑大华编撰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记载的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显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黄炎培在上海发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乡建实践（1917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等等，这些垂范后世的乡村建设实践，大都由知识分子发起，通过组建团体，以在地化试验开展，形成驻地发展的乡建模式。虽然百年乡建历史中，还穿插存在着“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和“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这两类常被遮蔽的广泛实践。时至今日，驻地发展是乡建团队在地化试验的主要模式。

百年乡建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情自觉与实践担当，乡建驻地发展呈现出与时代任务紧密结合的特征。21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行动分为世纪初新农村建设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两个主要阶段。

新农村建设时期的乡建实践，以论坛为手段，推进社会倡导与平台建设。21世纪初，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使得中国“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新农村建设推动乡村建设时间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相继成立，乡建团队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开展了合作社论坛、乡村建设论坛、平民教育论坛等，通过研究国内外及历史上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培养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乡村建设和农村综合发展实践经验。

乡村振兴时期以来的乡建实践，以驻地发展为模式，推进校地共建与在地化试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建设铺设出了崭新图景。在这一阶段，乡建团队通过校地共建等方式，在全国各地设立乡村振兴研究院与专家工作室，开展乡村振兴的政策咨询、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在地化研究。同时也通过硕博研习营等形式，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进行多学科的碰撞，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与资深实践者授课，学员根据自身专业知识、当地特色及前沿议题展开多主题田野调查，造就出一批“深入乡村、熟悉中国、一懂两爱”的综合型“三农”领域研究人才。

当前，校地共建成为了乡建团队通过驻地开展在地化试验的主要形式。2018年，福建农林大学与永泰县人民政府共建永泰县乡村振兴研究院，这是国内首家县级乡村振兴研究院；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大宁县人民政府共建大宁县乡村振兴研究院；2020年，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与屏南县人民政府共建屏南县乡村振兴研究院，以及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德化人民政府共建德化县乡村振兴研究院……正如温铁军教授在给《乡建笔记》作序中所言：“过去二十年来，秉承着‘维护民生、促进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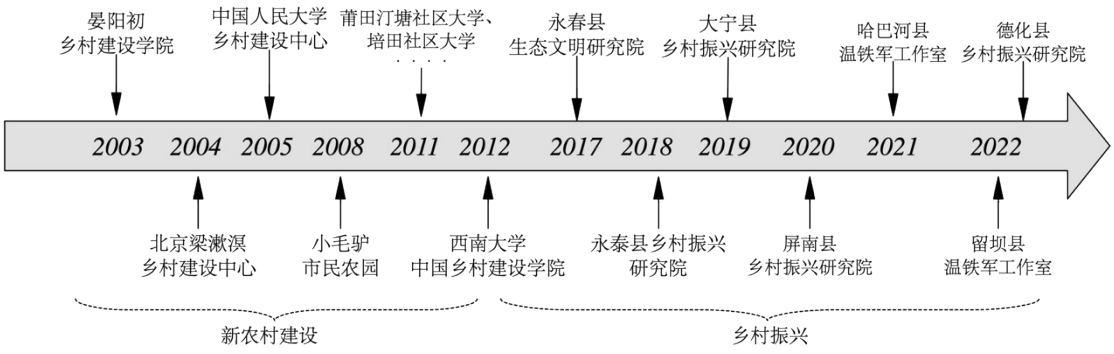


图1 乡建团队驻点的时间轴

提倡多元’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个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社会各个阶层自觉参与的、与基层农民及乡土文化结合的实践性社会改良试验，如今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硕果累累，并且最终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融为一体。”

校地共建的驻地发展模式有三点特征：一是乡村振兴理论与地方发展实践相结合，注重地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模式推广；二是以高校师生为主要赋能乡村的主体，呈现出驻点围绕高校集聚的特征；三是注重上层政策与基层试验的“上下来去”互动，开展顶天立地的在地化试验。

（二）实践思考：驻地发展模式要处理好的三对关系

乡建团队在当前主要以校地共建研究院的形式在各地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在全面乡村振兴与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历史基点上，驻地发展模式将比任何历史时期迎来更好的实践条件、更丰富的实践内容，以及更被各界期待的实践结果。但从各地驻点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发现，未来驻地发展需要处理好条件、过程及结果存在三对关系。

一是条件层面的上层路线与在地化人才的关系。早在1935年，梁漱溟在自省和总结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经验就明确指出乡村建设要么“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要么“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反思，而这一问题亟待在当前乡村建设行动中解决。在国家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乡村建设行动局面下，乡建团队作为外部主体进入特定场域开展在地化试验往往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走上层路线能够通过高位推动来实现乡村建设项目的落地，但这一路线容易受到主政者升迁和岗位调整的影响。为了避免人离政息对乡建工作开展的影响，培育具有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在地化人才、孵化在地化产业、促进要素回流、培育新业态，进而实现以嵌入式内源发展为内核的乡建驻地模式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二是过程层面的赋能定位与使能角色的关系。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但是否主要由农民来建？这一问题在政策或理论都未有明确的答案。无论是地方政府抑或是当地村民，都对高校师生组成的研究院寄予了较高的期待，因而研究院成了地方公共事务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逐渐承担或代为履行了某些职能部门或村民的事务。那么，研究院在其中是作为一个赋能主体还是使能主体？这是在地化试验过程中每个事项都需要处理好的关系。在嵌入乡村的过程中，对于村庄的公共事务既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越俎代庖，重视制度企业家精神在政策互动、准入退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赋能在地化组织的重要作用，培育农民主体性，辅助其提升在地化组织程度，是乡村建设的核心要义。

三是结果层面的立竿见影与久久为功的关系。驻地发展模式中，当地人民是主人，研究院是客人。作为校地合作的果实，地方政府受政绩竞标赛的驱使，更乐意看到研究院作出立竿见影的成绩。然而，乡村建设虽时不我待，但仍需久久为功，正如乡建先贤卢作孚所言“做事不怕慢，只怕断！事贵做得好，莫嫌小！做事有两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久久为功、从容建设就是属于乡建自己的企业家精神。

（三）接力陪伴：乡建学术化的人大实践

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已成功举办了两届，逐步成为乡村建设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活动。每届研习营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都是最多的，他们分别是岳晓文旭、罗建章、欧阳威、李晓彤、蔡欣、何邦华、蔡新怡、龚明月、慕天媛及宋澜。

在两届硕博研习营中，我们不断在挖掘屏南这座“富矿”，围绕“工料法”与社区治理、制度改革与“三变”、粮食安全与生态转型、金融创新与资源资本化、艺术乡建与城乡融合、古籍保护与村史馆规划等专题开展了深入调查研究：在四坪村参加了研习营与产权改革设计研讨，在龙潭村参访了老人会与新型乡村社区化治理，在三峰村、熙岭村、垅头村调研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塘后村、前塘村、梨洋村调研了乡村振兴指导员的“反哺乡土”实践，在山墩村、前垅村、寿山村、际头村、白玉村等探索资源资本化实现机制与三级市场落地方案设计，还在漈下村参观了张书岩老先生以馆筑梦、传承文化的耕读文化博物馆，在四坪村见证了返乡青年潘国老创办爱故乡合作社、新村民陈宇凡携家带口培育新业态的行动……

我们既有感学失求诸野，又欣喜于屏南实践的见闻与收获。在屏南干部身上看到了“抓机遇、懂变通、早规划、善总结、敢创新”的政策企业家精神，他们愿意下沉到乡村一线，与乡亲、学者们一道探索屏南县如何踏出一条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图2　人民大学学生在研习营的合照

左图为首届研习营人民大学营员合照(2021年8月),从左到右依次为,岳晓文旭、罗建章、潘家恩院长、李晓彤及欧阳威;右图为第二届研习营人民大学营员合照(2022年8月),从左到右依次为蔡欣、何邦华、蔡新怡、罗建章、龚明月及慕天媛

驻地发展，接力陪伴，携手共同促进乡建与学术的良性互动。潘家恩老师给人民大学的营员们赠书的扉页上写有“乡建路上，携手同行”。以人文社科见长的中国人大学子只有与中国乡村实际相结合才能实事求是地做“真学问”。在往返于“象牙塔”与“泥巴墙”的驻地实践中，我们将一方面对乡建的实践作出系统性地归纳梳理、并丰富和发展乡建的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乡建学术化”；另一方面是尽力将我们所学的知识转化成农民能听得懂的、愿意听的和对乡村有帮助的知识，推动“学术乡建化”。乡建总相见，我们与研究院一同携手同行、接力陪伴，以实践经济导向推动乡建学术化，并通过知行结合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人民大学学子的乡建足迹。

（编辑：程俐萍）